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纲

甘肃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纲

宋一秀　鲁修文等编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纲

宋一秀　鲁修文等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3　字数189,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

书号：2096·53　　定价：0.95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2）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8）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24）

第四节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目的和意义 ………………（53）

第二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形成到系统化（1919—1937）

第一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61）

第二节　毛泽东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74）

第三节　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89）

第四节　《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114）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全面发展（1937—1949）

第一节　开展整风运动，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34）

第二节　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揭示了战争的发展规律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146）

第三节　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167）

第四节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唯物辩证的

工作方法 ……………………………………………………………(185)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949—1957)

第一节　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98)

第二节　反对否认矛盾的错误观点，进一步阐明对立统一学说 ……………………………………………………(205)

第三节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219)

结束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在唯物论方面，提出著名的“实事求是”原则，深刻发挥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240)

二、在认识论方面，系统论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243)

三、在辩证法方面，集中论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245)

四、在辩证自然观方面，着重指出了物质的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 ……………………………………………………(248)

五、在唯物史观方面，重点阐明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的历史唯物论 ……………………………………………………(252)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 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具有显著特点。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正在我国理论界、哲学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开展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78—79页。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这是我们必须阐明的首要问题。但要阐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现代哲学史等科学的区别和联系。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任务、内容也就不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但是，由于客观事物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确定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时，既要把握它的特殊性，也要把握它的普遍性，才能科学地确定它研究的对象，以及它和其他科学的联系和区别。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与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两门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学科。我们既不应把二者绝对割裂开来，也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征应该如何概括？现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定义和概括，问题在于要揭示它的本质特征。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党的新党章总纲中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得到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丰富和发展。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哲学的论证；对背离这种结合的错误倾向，作了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对如何实行这种结合，从哲学上提供了方法。因此，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根据。总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同毛泽东思想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研究世界的本质、物质和运动、存在和思维等相互关系的，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由一系列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等组成的理论体系，是对人们实践和认识成果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主要是阐明这个理论体系如何科学地揭示世界的本质、物质和运动、存在和思维等相互关系以及再现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阐明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原理的内容、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同客观世界的联系和区别；阐明这个理论体系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大意义，等等。

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则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

成和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因此，它是一门历史科学。它着重要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范畴、原理和体系的形成、成熟和发展过程中，是怎样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社会历史条件（如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等）发生联系，怎样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继承、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中国哲学史上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优秀遗产，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新情况、新经验而创新和发展的；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产生和发展的长途中，是怎样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斗争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等等。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从纵的历史发展上去研究、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客观地全面地考察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再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内在必然性。

深入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正确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一概括和总结，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其基本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任何想把二者割裂开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带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任何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也是完全错误的。从这

一本质特征出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从内容方面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活动，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谓丰富和发展，主要是指对实践中提出的新矛盾、新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这就是说，仅仅指出新矛盾、新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理论上加以系统地阐述。这种系统的阐述就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等等；根据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进一步解释和发挥，并加以系统化，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根据实践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新领域，提出新领域的新理论，如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国际斗争的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的光辉范例。

从形式方面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它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特色，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中国化。这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而且也批判改造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遗产，即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中的精华，并且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这是毛泽东

哲学思想独具的特色。

从社会作用方面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它要求哲学帮助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把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同志强调搞实际哲学、群众哲学，不要搞书本哲学、抽象哲学。他历来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多次号召哲学要从课堂上和书斋中解放出来，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深刻的哲理，把它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他还一贯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了思想方法论的完整体系。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两者有密切联系，也有显著区别，既不应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也不应把它们完全混淆起来。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它着重阐明党在集体奋斗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相结合的历史；阐明党在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伟大胜利和成就的历史；阐明党在进行自身的建设中，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以至错误路线作斗争而逐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专门研究党在哲学理论方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当然，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必然要涉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实际斗争，

但它是为了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诚然，在各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课中，都应当很好地研究和讲授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方面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历史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帮助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然而，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由毛泽东思想史或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来取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反之，也绝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毛泽东思想史或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否则，就会把一部党的斗争史仅仅变成一部思想发展史，这显然背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

此外，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也要同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结合起来，既要以中国现代史为背景来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又要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现代哲学史，是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各种流派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要着重阐明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阐明唯物论和辩证法不断克服、战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最光辉的部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空前的大革命，它标志着中国旧哲学的终结。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必须具体地再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这个过程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其内在联

系，从而阐明其发展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①。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一定时代自然、社会和思维矛盾运动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我们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除了阐明它的对象和任务以外，还必须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研究任何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时代的特点。离开一定的时代，就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并确定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其特点是：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和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时，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准备时期，其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做好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总结了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无产阶级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列宁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革命形势逐渐高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已由准备时期进入直接实践时期。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他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新时期。较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活的时代,这个时期里,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有的矛盾缓和了,有的矛盾激化了。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此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已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了。十月革命后，时代给革命者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崭新的重大课题，它是世界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困难而又特殊的新课题。

列宁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

别崇高的任务”①。他接着说：“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②列宁认为，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现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时期到来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提出的困难而又“特殊崇高”的任务。为什么呢？这首先是由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情况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矛盾复杂的大国，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而又激烈尖锐的矛盾，成了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你争我夺的一块肥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极为奇特的图画。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而又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幅矛盾交错的图画。他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③他紧接着进一步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10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指出：伴随着上述各种矛盾发展而来的，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反动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种种矛盾就日益尖锐化。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就能知道当时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下；就能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所有这些，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正确地回答了时代提出来的新课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华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采取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残酷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夜的近八十年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其中较大规模的就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和反抗斗争。从政治方面来说，其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期间出现的三次革命高潮；从思想

方面来说，主要经历了农民阶级平均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三种社会思潮。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加强。在此期间，中国人民虽然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终究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走上独立、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它的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更日趋尖锐和激化。辛亥革命的失败，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不可能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输入和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随着从官僚买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乱作一团、无暇东顾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趁机发展起来，同时日本和美国在华的企业也迅速增长。民族工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带来的共同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日益成长和壮大，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已达到约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左右。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规模也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的四十一年中，罢工斗争共计有105次，而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的短短几年中，罢工斗争就达到130多次，罢工的规模也一次次扩大。历史的发展，要求正在迅速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起来取代资产阶级担当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正面

临着新的转折点。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这给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解放道路，从而使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让位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很快出现了世界革命的高潮，西方和东方许多国家都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一八年初，芬兰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成立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同年十一月，德、奥也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专制。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同年四月，德国巴伐利亚省也曾建立苏维埃政权。此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罢工运动日益高涨，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壮大着世界革命的力量。

在十月革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祖国的危亡、民族的苦难，争取独立和解放，曾经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企图仿效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们“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先进的中国人民总结了多次斗争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新的阶级力量，以指导和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希望。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页。

人民的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十月革命向全世界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劳动大众要摆脱贫困和压迫，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要获得解放，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说："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①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中，经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战斗威力。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形势，这一方面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任何真正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新，除为一定时代所规定和一定阶级利益所制约外，还有其思想理论来源，有赖于对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的扬弃。诚然，对这些精神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

财富的批判与吸收、继承与发展，取决于时代的需要和阶级的利益，但如果不从一定的思想资料出发，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也有它的理论来源，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哲学优秀遗产的批判与改造。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而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另一个特殊的思想体系。因此，任何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极端荒谬的。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重复或机械的套用，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回答了新问题，概括了新经验，增添了新内容。因此，任何想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贡献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十月革命后，特别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就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直至晚年，他还谆谆教育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学生。他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①他一再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宇宙观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并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因此，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他认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②这是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和普及。在延安，他发愤读书，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和其他哲学著作。他应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曾亲自给学员讲授哲学课。住在杨家岭一段时间里，他每星期三晚上召开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哲学座谈会，推动干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后，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他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倡议召开新哲学年会，并号召大家积极学习新哲学，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学习活动。在社会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强调要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强调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所要求的。毛泽东同志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不迷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改造和运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并不是说，它与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毫无关系。相反，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民族化，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又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毛泽东同志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隋代学术和历代史实等等，都有相当精湛的造诣，这就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从而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的民族形式、作风和气派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的哲学遗产是异常丰富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精神文明的民族，也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既深且广。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改造和吸取了中国哲学中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优秀遗产，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唯物论、认识论的改造运用。

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朴素唯物论的优良传统，从孙武、墨翟，中经荀况、韩非、王充、范缜、柳宗元等到集古典唯物主义大成的王夫之，其朴素唯物论的传统从未间断。毛泽东同志从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养料，通过改造赋予崭新的意义。

在这里，最突出的事例是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发挥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语最早出于班固所著《汉书》。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做学问，广泛搜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学者颜师古把此语注释为“务得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事实，每求真是也”。其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这本是指“修学”的一种求实学风。毛泽东同志在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高度，并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这一赋予新意的解释，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点用民族化的语言作了深刻的表述，而且指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

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论军事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曾多次引用，并把它誉为“科学的真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②。这就把战争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高度结合起来，揭示了战争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学习阶段，就是认识战争客观发展规律的阶段，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战争的规律；使用阶段，就是自觉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实践的阶段，即由理性认识再回到战争实践中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说，任何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中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古典哲学中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哲学问题，即知行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说。宋明以来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论争。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说；王阳明则主张“知行合一”说；王夫之批判朱熹的“先知以废行”和王阳明的“离行以为知”的观点，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王夫之哲学思想，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孙中山则提倡“知难行易”说。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就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的著作，曾接受过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五四时期，他已接近于王夫之的“知行相资”说。他在世界观根本改变以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史的优秀遗产，充分地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从而使知行关系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此外，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讲话和报告中，还引用了许多富于哲理的成语典故，来说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思想。诸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闭目塞听”、“一知半解”、“削足适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等。所有这些，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改造、引用，都升华到了辩证唯物论的高度，读起来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亲切感人。

2.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改造运用。

中国古典哲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多采。英国著名的学者T·李约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发源于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改造，而后又转向了它的发源地。这一论断是颇有见地的。中国古典哲学从古代的《周易》、《孙子》、《老子》，中经韩非、扬雄、王安石、张载、方以智等，到集古典辩证法大

成的王夫之，其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也从未中断过。毛泽东同志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使其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天才地猜测到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贯通和相互转化，并看到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毛泽东同志在写文章、讲话和作报告中，经常引用中国古典哲学、历史文献和成语典故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和提高，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

《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作为占筮之用的书，带有宗教哲学的色彩。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易经》把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抽象概括为阴阳两个最基本的范畴，认为它是一切具体事物共同具有的两种对立的势力。它认为，阴阳互相交感产生万物，并推动着事物由低到高的变化发展。这种概括，说明中华民族在古代的抽象思维能力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我国《易经》思想时曾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①后来，《易传》对《易经》的思想进一步作了解释和发挥。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它把阴阳相互作用（交配、交合、交接）看作是一切事物形成、变化和转化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对立时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①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阐释，就把古代的阴阳学说同辩证法的两点论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孙子兵法》是孙武对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它是一部论战争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它在中外军事史和哲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译成法、英、德、日、俄等多国文字，广泛流传。孙武认为，指导战争必须做到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他要求对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天时、地利、将帅、士兵等方面，做出详尽的了解和全面的分析。他还主张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促使矛盾的转化。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对立的范畴，比如敌我、主客、治乱、强弱、众寡、分合、攻守、进退、久速、曲直、劳佚、奇正、勇怯、虚实、动静等，并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了一整套朴素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但也不能否认它吸收了孙武等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除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以外，毛泽东同志还把《孙子》中不少合乎辩证法的论断运用于战争，比如引用"以逸待劳"，来说明以养精蓄锐的部队来对付奔走疲劳之敌；引用"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来说明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然后给予打击；引用"示形"之类的方法，来制造虚假现象以迷惑敌人，即所谓声东击西；引用"出其不意"，来说明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在敌人处于毫无准备和料想不到的时候进行攻击，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老子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富于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著作。老子看到了许多对立的事物，都是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的。比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明暗、进退、白黑、巧拙、奇正、善恶、强弱、兴废、曲直、多少、大小、得失、祸福、生死等。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复为奇（异），善复为妖（灾）。"老子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极为宝贵的，它对人类的认识和我国哲学思维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老子把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都看作是无条件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说明。毛泽东同志改造和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他在讲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①这就明确指出了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性。他还引用《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思想，来说明战争中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深刻阐明了对立双方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原理，这除了总结实践经验以外，无疑也是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还广泛引用富于辩证法思想的名言，并加以改造和吸收。诸如，"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因势利导"、"犬牙交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叶障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目，不见泰山”，等等。所有这些，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扬弃，都加进了崭新的内容，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大放异彩。

综上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使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必须指出，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这种联系，如果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看成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长过程中，虽然蕴藏着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以后，就宣告了中国旧哲学的终结，才有了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民族形式的统一，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富有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喜爱，并容易掌握、理解和运用，成为革命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思想武器。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开始萌芽、初步形成于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达到系统化和完全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但在一段时间里曾走过曲折的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才能比较完整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才能比较系统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才能比较完全地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才能在新的革命征途中自觉地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

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是党的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党的幼年时期。他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明了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一是革命的实践经验非常缺乏，二是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没有深刻的了解。可见在这一阶段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沃土上已经开始萌芽，这主要表现在：

（一）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开始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3页。

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源泉，必须用革命手段消除列强在华特权，肃清军阀势力，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同年七月，党的“二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的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提出了革命要分两步走。《宣言》明确指出：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国情，初步回答中国革命提出的问题。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机会主义观点，表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观点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它们的表现形式虽不同，却从不同的方面否定或架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当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为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揭示了中国社

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①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

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指责和攻击，毛泽东同志亲自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是当时调查研究农民问题的一篇杰作。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根据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论述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由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分析，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出发，指出了对待群众运动的三种态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问题。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8页。

的实际发挥。

实践表明，从一九二一年党的诞生到大革命失败，这期间我们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开始探索中国的国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指出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总结了经验。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始结合，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在哲学上作出了一些概括和总结。但由于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根据中国的国情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仍处在萌芽状态。

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懂得了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紧紧依靠农民开展武装割据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随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二百多次的武装起义，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同志认真总结经验，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初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陈毅同志曾说：“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

和提高。”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在战争环境中认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国内外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政治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杰出的创造和发展。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又找到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不仅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特别是矛盾分析观点的创造性运用，而且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中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第二，提出了建党建军的正确原则，初步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红四军召开“九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奠定

①转引郭沫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中国哲学》第一辑，第33页。

了我军的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和资产阶级建军思想的界限。早在井冈山时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就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以后，逐步制定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为我军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作出了贡献。

第三，揭露本本主义的错误，同教条主义和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上对党的实践斗争经验作了概括，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叫《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斗争的哲学总结，它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首先，它作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并进一步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其次，它首次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三，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办的保守思想路线。它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明确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表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中作出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综上所述，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党创造性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揭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提出了一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科学的结论。这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但还没有系统化，仍有待革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并从中进一步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系统化的重要时期。

这一段时间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这一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这种“左”的错误倾向的主要特征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得照办，凡是苏联的经验就得照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成熟和系统化的。

（一）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了国内外新的矛盾和问题，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政治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新的形势、新的矛盾，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基本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与此同时，为了争夺中国，帝国主义之间、其他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则暂时降到次要地位。就是在地主买办阶级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也会有分化。这就是说，敌人营垒中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其矛盾是会发生变化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他具体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分化，指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总之，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表现、性质及危害性，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思想，同时告诫全党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形势、矛盾的辩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分析，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二）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斗争领域，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形成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推广运用于军事斗争领域，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指出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阐明了把握战争规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战争中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论证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贡献。

（三）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作了系统的发挥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同志以《实践论》、《矛盾论》的观点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这两篇哲学论文是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篇哲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

基本观点，划清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思想路线的界限。它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上述表明，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这七年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时期。同前一时期相比，它的内容更充实、更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也反映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与全面发展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系统化到成熟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期。这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最光辉、最生动、内容丰富多采和多方面展开的时期。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系统和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和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其主要之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就是在这个时期趋于成熟并系统化的。在这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初，毛泽东思想最终为全党

所公认，被确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已达到了完全成熟时期，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

（一）系统地论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献中，指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认为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延安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是反对唯心论宣传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在“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斗争考验，并一再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以后，为全党一致公认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揭示了战争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和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用客观的全

面的观点考察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和指导战争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以及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又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著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战略进攻学说，制定了战略决战的军事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的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了充实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阐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批判了混淆两个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方面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

命道路。这些思想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中创立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怎样把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化为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他说：“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这就要掌握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党领导的工作经验，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还说：“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7页。

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①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还反复强调必须重视科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基本的方法，有具体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等等。具体方法有：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两条腿走路、波浪式前进，等等。毛泽东同志创立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更加广阔和现实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综上所述，在这十二年里，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发展，斗争不断深入，我党的革命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这些都反映在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中。因此，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上更深刻、更完整，在体系上更严谨、更系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新时期的新特点，如何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既不能沿用民主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7页

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以解决新任务。因此，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新时期的实践经验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正确地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在我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进行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生产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的国家里，把个体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互助合作的形式，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时把个体生产者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生产者，这是我党对小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极其辉煌的胜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杰出运用。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改造和技术改造的辩证统一。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运动中，我们党又正确解决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采用"和平赎买"的方针，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实践证明，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增添的新内容。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8页。

（二）通过调查研究，阐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在两个月时间内，亲自听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运输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然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他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他强调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关系和矛盾，都是针对着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提出的，充分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一新内容。

（三）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的原则还灵不灵？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完全适合，没有矛盾？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作出科学的回答，否则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当时，国内外许多人，由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早在五十年代以前，苏联某些党政领导人就断言社会主义社会已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只有统一，只有差别。后来，苏联的哲学家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是"和谐的"辩证法，"辩证的对立、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他们忌讳"对立面"的概念，主张抛弃"统一物区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旧公式"。总之他们认为，发展已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是差别的统一和融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背叛。毛泽东同志针对国际上这种公然抹煞矛盾，反对辩证法，鼓吹形而上学的思潮，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具体地阐明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创立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从而科学地回答了时代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碰到的新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新发展。

总之，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这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篇章。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一九五七年四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又可以区分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哲学思想中，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两部分。我们必须把正确和错误区分开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给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不少光彩夺目的新的颗粒；同时在他的言论中，也存在着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错误论断。然而，即使当他犯错误的时候，包括犯“文化大革命”这样带全面性严重错误的时候，他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还始终坚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这正是他晚年的悲剧所在。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的新内容，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这些思想，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一九六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说：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

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① 他以民主革命为例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②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③ 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哲学总结，也是对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的生动而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发展的规律。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

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8—19页。

③《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27页。

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既反对了骄傲自满、停止不前的错误思想，又反对了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错误倾向，指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对自由和必然这一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揭示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的认识发展规律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实践论》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篇文章简洁明晰还不足一千一百个字。但思想容量很大，很丰富。它批判了唯心主义认识论，指出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阐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个飞跃；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①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指出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等等。总之，它不仅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也揭示了人们认识运动的分过程，从而把解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的辩证途径简明扼要地阐述出来了，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三）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事先密谋炮制了一份"称天才"的材料，竭力鼓吹天才论。毛泽东同志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认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这就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同志在天才问题上，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了唯心论的英雄史观，坚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这就把认识论中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历史观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了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深化，也是对《实践论》关于天才问题的论述的深入和发展。

（四）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伟大战略决策，这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的光辉范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同志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准确地把握世界形势的新发展，确立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作出了高

度的评价。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两种矛盾、三种力量和中间地带的理论。进入六十年代，国际政治力量、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变化。到了一九七四年二月，他完整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制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为国际反霸斗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年四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注意。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结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战斗的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实践已经表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过严重的失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经济情况认识不足，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加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急于求成的愿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道路上遭到了曲折，招致了严重失误，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实践表明，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一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也背离了毛

泽东哲学思想。为什么一生都倡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在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错误思想路线斗争中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哲学思想的人，在晚年竟然陷入了主观主义，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轨道呢？应当指出，在理论上，毛泽东同志还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前提的；但在实践上，却往往从美好的理想出发，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违反客观实际的估量，结果导致在政治上犯了“左”的错误。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范畴，所以我们就不再作具体评述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确地区分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

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这一时期，是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一次会议。在新时期中，我们党在实践中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和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中。

（一）总结历史经验，重新确立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党的历史一再表明，凡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发展；凡是背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就必然遭受挫折或失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生的“左”倾冒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混淆是非以至混淆敌我的错误，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所造成的。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上，是完全正确的，是至关重要的决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阐明了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党的指导方针。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就无法拨乱反正，也无法开创新的局面。而歪曲解放思想的方针，把它曲解为随心所欲，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只能有害于党的事业。这两种倾向都要继续反对。我们讲解放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遵循党的思想路线，必须立足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必须有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总之，解放思想必须符合而不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把思想路线的解决，提高到党和国家存亡的高度，提高到是否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运用和发展。

（二）根据实践经验，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① 这就指明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大大加深了，而且揭示了"十二大"将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向胜利的内在根据。

一九五六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那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知道甚少，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中，从思想、政治、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党的建设等方面，说明我们在三中全会以后，不但在指导思想上分清了是非，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通过总结三十多年来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从过去那种不完全、不准确的状况，发展到比较完全、比较准确了，基本上实现了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的程度。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对一般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党中央认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建设的规律，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尤其要研究中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页。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一切别国的建设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都是重要的，应该吸取有益的成分作为借鉴，但生搬硬套，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党坚决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还要进一步研究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特殊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三）从实际出发，逐步确立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他还说："中国的事情要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 这就为确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逐步地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它的主要之点则是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本总结。

①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页。

这条道路的主要点体现在六中全会《决议》总结的十条中。这十条的基本思想指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正确途径。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必须准确地估量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第四，必须逐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等。这十条要点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找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现在，我们党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逐步清除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已经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经济渡过了最困难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十二大”报告规定了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并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的几个重要原则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纲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尽管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但是，“十二大”提出的经济纲领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使我们不致重复过去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的错误，防止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面前徘徊观望，踌躇不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纲领，也是可以实现的纲领。以这样的纲领来保障我们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摆在经济建设方面，将使我们稳步地达到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发了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 并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的重大问题。

"十二大"报告从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从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包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它对社会主义特征作了全面概括，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明确解释，对两种文明的辩证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对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进行了深刻阐明。所有这些论述，都具有新的见解、新的思想，从理论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战略中的意义和作用。

"十二大"报告指出："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② 并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作出了新贡献。

综上所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为毛泽东哲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8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9页。

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胡耀邦同志说："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①事实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党中央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十二大"文献，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范例，也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新的结晶。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不断开放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第四节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目的和意义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就是要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阐明它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阐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阐明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从而客观地历史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样实事求是地、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利于我们学习、研究和宣传这一客观真理，认真做到既要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又要注重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根本目的和重要意义。具体点讲，包括以下几点。

---

①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页。

一、为了自觉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提高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自觉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总结了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其核心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的伟大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再次确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实践表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方面要坚持，怀疑、动摇、任意贬低，甚至认为已经过时，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要发展，尤其要注重发展，那种死啃“本本”、鼓吹“凡是”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目前，进一步摸清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既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就必然要求这种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事实上，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已把这种结合过程大大向前推进了，并获得了重大的成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篇章。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

前进。”①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②“十二大”的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善于针对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我们长期地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③这就说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新的实践的需要，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推向前进的需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为了自觉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就要认真开展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二、为了更好地坚持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可以增强我们鉴别理论、路线是非的能力，更好地掌握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坚持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自觉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

---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51—52页。

②《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2—3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67—68页。

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一贯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而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②这条思想路线贯串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根本点，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思想路线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化为方法论并贯串于实践中的哲学路线。

实践表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正如同布帛菽粟一样，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我们党六十多年来的战斗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挫折、前进和后退、巩固和发展，都是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还是背离党的思想路线紧密相联的。我们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是否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回顾六十多年以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怎样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又是怎样一再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使我们深深懂得：要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牢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总结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扬党的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7页。

②《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第7页。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逐步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克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影响，树立和发扬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努力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三、为了坚定地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可以锻炼我们的科学思维能力，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一个民族要想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单靠有革命的热情、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必须具科学的世界观。为了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促进我们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科学化，除了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以及重要的历史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说得好，要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全部哲学史的优秀成果的总结，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马克

---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要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历史。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能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而自觉地努力奋斗。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要紧密联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全局，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就是说，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又要调查研究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进。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是全党今天最大的新情况，最大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象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①我们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武器，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十二大”设计、规划和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工程逐步变成现实。

①《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4页。

第二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形成到系统化

（1919——1937）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象两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多年间，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但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的理论，结果都失败了。

一九一七年，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给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巨大鼓舞和希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自身解放的中国人民。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从此“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分析正在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又认真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而且创造性地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同志还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即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为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又全面总结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哲学著作。他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发展的规律，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同一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页。

性和斗争性以及矛盾问题的精髓等一系列重要哲学理论问题，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一、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的激化，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其直接原因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美、英、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分赃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废除外国在中国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利等要求。由于帝国主义的操纵，和会不仅蛮横地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特权，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成为有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

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自己的战斗威力，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有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这样，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就宣告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从此开始了。

二、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在进步报刊上宣传马克思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见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必要，决心投入工人运动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运动。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刊物不断涌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社团普遍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在这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主要领袖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一九一八年下半年，他就在进步刊物《新青年》等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苗发于今日俄国革命

血潮之中”。①又说：“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乃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②五四运动以后，他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论文。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年冬又在北京大学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在所有上述论文和活动中，他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想。他说：“……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他都作了介绍和论述。他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则是指“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上层

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②《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① 根据这一观点，他批评唯心史观是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李大钊的论述虽有不精确甚至错误的地方，但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起了播种者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向往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趋向社会主义。当时，由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曾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给中国人民学习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条件。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指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②，此后，他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揭露了在这一反动理论掩盖下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的事实。他说：“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的不足，”所以，在财产权私有的社会里，生活资料的不足，是由于“一班强盗尽有余了，别人便当然不足呵。”③ 他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他说：“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

①《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②《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③《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独秀文存》（二）第441、447页。

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①。一九二〇年九月，他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谈政治》一文，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抨击了封建军阀官僚的贪污不法，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誉，使他成为当时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但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仍经常暴露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例如，他认为“中国目前工业不发达，工人觉悟不高”，因此“政治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只能“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②。所以，他后来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偶然的。他还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可以相容的，并试图劝说胡适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可见，在世界观上，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也是他后来堕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乃至叛党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五四运动时，他还在日本，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寄国内出版，积极参加当时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运动。一九二〇年春回国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并主编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创刊的《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又创办并主持了党的地下人民出版

①《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日。

②《革命与作乱》，《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社，出版了十余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等。李达先后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重要文章，全面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他概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重点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消亡等基本理论。①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他根据唯物史观论述了社会革命的原因，“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②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全面介绍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本质、目的和形式等。此外，李达还发表了数十篇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情况，第三国际情况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和译文，并积极参加了当时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三次大论战，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谬论给予有力的批判。

此外，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瞿秋白曾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以后改为不定期刊），从季刊到不定期刊共出九期，发表了许多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大量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马克思

①见《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

②见《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

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着手编译社会主义运动丛书。他还领导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途径，批判各种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流派，并经常给国内写信，报导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一九二一年回国后，他担任了党中央宣传部长和《向导》周报主编，更加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也经常给国内通信，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主持下，还在法国建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马列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并出版《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宣传共产主义学说，批判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

总之，五四运动时期，经过中国先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肩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得到更加全面、系统的传播。而为了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也得到系统的介绍，因为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社会，才能懂得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乃是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才能改变。因此，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根本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然后才会有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才能变旧中国为新中国。这也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显著特点。

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三次论战中取得了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得到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极大恐惧。他们为了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阻止新思想的宣传，一方面，通过北洋军阀政府采用逮捕进步人士，查封进步报刊等暴力手段，严防“过激主义之鼓吹”；另一方面，还通过胡适、张东荪、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从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猖狂进攻。

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忠实信徒。一九一九年七月，他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挑起“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遭到反驳后，他又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极力鼓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社会改良论和阶级调和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他从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出发，割裂主义和问题之间的联系，认为主义不过是个“抽象名词”，而“世间没有一个抽象的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因此，“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是会被人利用来“骗人”、“害人”的。正是在这一荒谬理论的借口下，他反对“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①，胡说“十篇‘剩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②，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胡适大力鼓吹“多研究些问题”，什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

①以上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②《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①都要研究，就是不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还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诬蔑这一理论“养成一种阶级仇恨心”，②其目的就是反对通过革命手段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为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效劳。除胡适外，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曾琦、李璜、左舜生、罗家伦、傅斯年等也在所谓“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切实地求学”等口号下，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为了反击胡适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方志敏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特别是李大钊，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给胡适以迎头痛击。他首先驳斥了胡适割裂“主义”与“问题”的谬论，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明确宣布自己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因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他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个根本的解决，然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他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

①《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②《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卷2，第196页。

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否则，“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①。这就彻底粉碎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谬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正在酝酿成立中。在这种形势下，以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反动分子又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新的进攻，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张东荪等人利用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实在论者罗素来华讲演的机会，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罗素于一九二〇年十月来到中国，次年七月离开，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演讲。他一方面发表反苏谰言，诬蔑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则宣扬“中国的到自由之路”，即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的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反对中国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张东荪等人极力贩卖罗素的反动说教，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他在《改造》第三卷第四号发表的《现在和将来》一文，系统的阐发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接着，本来就是改良分子的梁启超也在《改造》第三卷第六号发表《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可说是他们宣扬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纲领。

①《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张东荪等人公然否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无产阶级已经觉悟这一事实，断言在中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运动。他说：“论到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的经验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简直不能有何势力。”“现在只能谈到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梁启超又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兴起，“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因此现在谈社会主义，是“太越阶了”。既然中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出路何在呢？张东荪说，只有依靠“绅商阶级”即资产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增加富力及于一班人民。”

对于张东荪等人宣扬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李达、蔡和森、何孟雄等进行了坚决反击。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①。

①《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20日。

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也痛斥了梁启超的谬论。他说："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①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不但受到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掠夺，"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中国人民如果不愿饿死或在兵乱中死去，便只有起来革命，因此，"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②。在这次论战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仅彻底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反动谬论，而且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谬论，取得了论战的胜利，而且同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③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然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集中领导，就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为"专制"，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工农武装，就是"压制个人自由的表征"④，他们还诬蔑无产阶级国家及其法律是"抹杀个人"、"滥用强权"、"独裁专制"⑤等。并荒谬地认为"社

①见《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②见《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
③《国家、政治、法律》，《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
④《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⑤《为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奋斗》第8、9号合刊，1920年4月。

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①等等。他们宣扬这套谬论的目的，就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斗争，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是十分反动的。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一九二〇年起就开始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在论战中《新青年》曾先后发表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通信；《共产党》月刊也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等专文。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深刻地论述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因此，要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他还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攻击，“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②李达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

①《国家、政治、法律》，《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

②《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中也说："资本主义之后，当然是社会主义，如今要跳过社会主义的阶段，直接的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果无非是使众人不努力灭绝资本主义罢了。"① 一九二二年一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也曾把批判无政府主义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论战持续了一年多，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结束。

通过思想理论战线的三次大论战，一方面，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斗争中进一步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使许多人迅速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切，从思想理论方面和干部方面，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毛泽东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卓越代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

一、一九一八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和哲学思想

毛泽东同志一八九三年诞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

---

①《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5月。

家庭。他父亲原是个贫农，后来成了富农。少年时期，他在家乡的一个私塾读书。十六岁时进了家乡附近的一所新式小学——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所学校里，他读了自然科学和一些外国历史、地理书籍，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因此，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非常崇拜，也就产生了向这些人物学习和投身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参加政治活动和思想开始变化是一九一一年到长沙以后，这年发生了辛亥革命，他在长沙第一次看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读到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反抗清朝起义而牺牲的事迹，也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革命纲领。这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专制的斗争如火如荼，毛泽东同志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活动，并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孙中山作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作内阁总理，梁启超作外交部长。他还分不清孙中山和康、梁的区别，只模糊地认识到，为了反对清朝的专制独裁和投降卖国，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使他受到很大鼓舞。于是，参加了革命军，当了半年兵。在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篡夺、民主共和国的希望破灭后，为了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在半年的时间里，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密尔的《伦理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及世界地理、历史等书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等。在这些书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观点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感到中国再不发愤图强，就有被灭亡的危险。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一九一三年上半年进入第四师范，一九一四年二月，四师并入一师），这时正值国内连年内战，湖南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内新旧思潮的斗争日趋激烈，湖南也不例外。他回忆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① 在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同志最初的社会活动是参加学校学友会的工作，担任过文牍、总务等。一九一七年暑假前后，北洋军阀傅良佐的溃军要占用学校的房屋，他把同学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取得了保卫学校的胜利。与此同时，他征求"有智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用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共有二十八画）的笔名在长沙油印了一个启示，发到各个中学先后吸引了五、六个青年，他们之间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一九一八年四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民学会"，据现有资料查明，它有过六十六个会友，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毛泽东同志除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外，还刻苦读书学习。在第一师范期间，他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后来特别喜欢研究哲学，对谭嗣同的《仁学》、王船山和康德的著作发生很大的兴趣。在学习国文、修身等课程时，他还做了数千字的《讲堂录》，记下了自己的学习心得等。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出版后，他成了最热心的读者，最爱读陈独秀、胡适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和李大钊的《青春》、《今》等启蒙作品，并常把文章中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1979年版。

的精辟论述摘录下来，加以研究。他回忆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①他还写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在第一师范的老师中，教伦理学的杨昌济对他有很大影响。杨昌济在哲学思想上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追求新思想，信仰进化论，要求改造社会、国家，具有刻苦实践的精神，对学生起过积极作用。杨昌济采用的伦理学课本是德国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同志学完这本书后写了一篇叫《心之力》的论文，他回忆说："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②在《伦理学原理》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他回忆当时学习这本书的情况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象这本书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发，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③

从毛泽东同志的《讲堂录》、《体育之研究》和对《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他早期的哲学思想。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等一样，在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以前，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曾经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他思想中的唯心主义主要来源于我国封建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表现为片面夸大自我和精神的作用。例如，在《讲堂录》中有以下笔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1979年版。

②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1979年版。

③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41页。

记："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使宇宙一大我也。"还有："人心即天命"，"无者有之先也，故鸿荒以前，谓之无也，因此则鸿荒以后斯有矣"等。这就是说物质之我是小我，精神之我才是大我，它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按照这种精神行事才能成为大人。一九一六年，他在给黎邵西的信中，也有类似观点，他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信中，更十分强调人心的作用。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但"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个"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也就是所谓"宇宙精神"。所以他进一步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写的《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仍保留了这个唯心主义观点。例如，他多次提到"精神不灭"。还说："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等。毛泽东同志所以强调人心的作用，强调"大本大源"和改造哲学、伦理学的重要性，是和他救国救民的志愿分不开的。他认为只有认识了真理，改造了人心，才会有国家民族的改造。由于这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因此，只好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去寻求"真理"。

毛泽东同志除读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外，还读了不少自

然科学的书，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是有影响的。同时，他一直重视接触现实，例如，《讲堂录》上就写有“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游之为益大矣哉”。一九一七年暑假，他就和同学结伴步行近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进行社会考察，因此，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中又有不少唯物主义的因素，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提出：“精神不灭”的同时，还第一次提出“物质不灭”的思想。他还写道：“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在认识论上，唯物主义观点也很明显，他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皆知得此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著（作）皆是述而不作。”而在论述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些具体事情时，就完全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例如，早在批语之前写作的《体育之研究》中，其哲学观点就纯粹是唯物主义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在谈到德智体三育的关系时写道：“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又说：“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①可见，在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上，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要是在探讨离现实生活较远的“大本大源”问题时才表现出来。由于这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生活经历和实践经验的限制，使他还不能在世界本原问题上完全概括出唯物主义的

①《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结论，因而接受了当时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

至于辩证法的思想，在毛泽东同志的早期思想中也一直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他早在《讲堂录》中就写道："天下万事，万变不穷，""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这些话就包含了发展变化，矛盾转化，量变质变等思想。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同样认为事物不是静止不变的，矛盾双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更为可贵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已区分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并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者，必自自动始。"又说："……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辩证法的观点也是很明显的，他认为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事物内部是包含着矛盾的。"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他不同意鲍尔生所说："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而提出："此不然，盖人类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他还进一步认为，人并非自然之奴隶，而可以改造自然，他说："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

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他还认为一切都是可变的，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世界上只有各种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死也。”不仅自然界，人类历史也是不断变化的，“治乱迭乘，和平与战争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既然一切都是可变的。因此，他又说道：“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等。这些辩证法思想虽是可贵的，但不难看出，其中仍存在有相对主义成分。同时，有些思想也并非一贯的，例如关于人能否影响自然的问题，在另一处批语中又持怀疑态度。他说：“吾尚疑人是始终无能力者，虽精神发展之后亦曷尝不为自然界所规定邪？”

总之，从上面的引证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对哲学有极大的兴趣，但他的世界观还没有最后形成，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又有许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这对他以后彻底抛弃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朴素的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他要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但由于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民族怎样才能独立，国家怎样才能富强，革命的道路如何？他还不明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①

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转变发生在1918年到1920年间，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促使他完成了这一转变。

1918年8月，毛泽东同志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认识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经李的介绍在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在此期间，他旁听了北大的一些课程，参加了学校的哲学会、新闻学会，对政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思想也更加激进了。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他读了许多书，研究了各种新的思想学说，并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在一个时期内甚至赞同过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主张。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同志已回到湖南长沙，在全国革命浪潮的鼓舞下，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组了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并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出版了学生联合会的会刊——《湘江评论》，由他担任主编。这个杂志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的宣传者，也是民众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它大大推动了湖南以至华南诸省的青年学生运动。在此期间，《新民学会》也积极开展活动，在毛泽东同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1979年版。

志领导下，发动了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发表了驱张宣言，领导各阶层人民和张敬尧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回忆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①这时，他在政治上已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有很大发展，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说明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他热烈欢呼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并认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世界革命的浪潮必然到来。他写道："自前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至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他已认识到人民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创刊宣言》中，他写道："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他更认识到要推翻贵族资本家的反动统治，"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必须依靠民众，把民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他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为什么民众联合的力量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他认为经过长期斗争，广大民众已经觉悟了，已经认识到……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在五四运动掀起的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29页，1979年版。

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大好形势下，他发出了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号召广大民众联合起来，积极投入当前的革命斗争。他还批驳了轻视群众，否认群众有组织起来反抗强权者的能力的剥削阶级观点。他指出，不是群众没有能力，长期以来，群众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是由反动统治者造成的。“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现在不同了，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只要我们在斗争中去实践，去“练习”，“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希望。所有这些思想，都说明他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他的思想，特别是在对群众力量的看法上已远远高出于一般革命民主主义者之上。但由于这时接触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多，原来思想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还没有完全肃清，因此仍未摆脱唯心史观的影响，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还崇尚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在《创刊宣言》中，他说：“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这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因此，他虽然热情赞扬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却不懂得它开创世界革命新纪元的伟大意义。正因为他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还在不少地方表现出来。例如，他写道：“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

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就是明显的抽象人性论的观点。他看不见“强权者”和“平民”在阶级立场上的根本对立，抽象地把二者看作同类，他对强权者所以要滥用强权的解释也是不正确的，绝不是强权者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也不是旧社会旧思想对他们的遗传和毒害，而是由他们的剥削者、统治者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正因为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来看待“强权者”，他虽然主张用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来推翻贵族资本家的统治，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却反对使用革命暴力，而希图劝说贵族资本家放弃强权，回心向善。他写道：“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在《民众大联合》中，他还写道：“……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们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这就说明空想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中还严重存在。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时，苏联政府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发表出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为广大了。在北京期间，他读了许

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凡是那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的著作，他都找来仔细阅读。据他自己回忆，当时对他影响最大，帮助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有三本书，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因此，一九二〇年应该是毛泽东同志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一年，也是他在世界观上，摆脱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影响，开始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一年。

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后，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如筹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赴俄的勤工俭学，在《湘江评论》被封后又接着主编《新湖南》等。他还领导了湖南的自治运动，加强了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创办自修大学；与此同时，为了求得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发动社员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各国的革命运动，探求改造中国的一些根本问题。根据学会的宗旨，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会会员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蔡和森等坚决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进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唯有社会主义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1979年版。

才是“改造世界对症之方”，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中国“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而以肖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却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他说：“我们不认为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经过认真的深入的辩论，明确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蔡和森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把讨论情况和上述意见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肖子升等也给他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复信给在法国的全体会员，对蔡和森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反对肖子升等人改良主义的主张。在蔡和森的信中，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又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①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同志写了另一封信，信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分析了共产国际成立后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错误。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建党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最后他指出：“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为了给革命作准备，“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并对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步骤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〇年底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写了回信，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

①原载《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3集，1921年1月。

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①这就说明毛泽东已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是他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积极从事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后并作为湖南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参加了当时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斗争。一九二〇年十月，当罗素到长沙发表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说，张东荪等人挑起“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时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谬论进行了坚决批判。在给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他不仅反对肖子升的改良主义主张，而且谈到他对这个论战的看法。他明确指出，罗素企图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中国走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办教育医药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的世界，是剥削阶级统治的世界，“钱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企图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完全是一种空想。他还进一步分析，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他们有议会、政

①原载《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3集，1921年1月。

府、法律、军队和警察。”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共产党人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否则，“安能握得其教育权”？社会的改造就更谈不到了，他还通过对资产阶级本性的分析，说明资本家是贪得无厌的，“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更大的资本家”，这是不可改变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企图用改良主义的办法说服资本家接受共产主义，完全是荒唐的梦想，“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①他坚决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以达到对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他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深刻批判，连同前述的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都收集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中，在新民学会会员及部分会外“爱看者”中广为流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结合的硕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也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的新篇章。

第三节　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

①原载《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3集，1921年1月。

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王明等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情况缺乏了解，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先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很大损失。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重视调查研究，又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逐步做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开始形成。

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机会主义路线，它包括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它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另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陈独秀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旧观点出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唯心主义估计，得出了错误结论。他漠视工农群众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工人农民完全是

浑浑噩噩的一群，毫无革命要求，只能任人驱使。而资产阶级则不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①他看不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而认为既然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其发展前途必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有等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他口头上虽然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却否认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者——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诬蔑“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②，把广大农民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包括邓中夏、瞿秋白等）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部光辉著作，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这两篇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批判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诬蔑，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敌友问题，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初发表在1925年12月1

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峰》月刊第2期，1923年12月1日。

②《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周报第1卷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机关报）第4期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唯物地、辩证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根本观点。它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末期已开始萌芽。

首先，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出发，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这一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竭力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反对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第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受到他们的压抑；同时，由于它是一个剥削阶级，又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这一经济地位就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所以，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是个动摇的中间阶级。第三，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他们是小生产经济的代表，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军阀买办的压迫和剥削，是可以参加或附合革命的。第

四，半无产阶级，他们经营的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需要一个变革实现的革命。第五，无产阶级。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无产阶级因为丧失了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因而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他们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毛泽东同志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分析入手，然后又进一步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分析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

其次，他又用唯物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具体分析，深刻揭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第一，他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分析社会各阶级时，既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不把它们一律看待。例如，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既看到它和各国资产阶级的共性，即残酷地剥削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等；又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即经济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动摇性。又如，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既分析他们中间不同阶层的特殊性，又指出他们的普遍性。拿小资产阶级来说，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对革命取怀疑态度，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一部分是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对革命取中立态度，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派；还有一部分是生活下降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在分析的基础上又进行综合，找到他们的普遍性，即在革命高潮时，可以参加革命或附和革命。第二，从革命发展中来分析各个阶级、阶层的变化，不把他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民族资产阶级在受外

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感到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但是当革命进一步发展，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又有国外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时，由于感到其阶级地位受到威胁，又变得怀疑革命。又如，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和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比较接近，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是颇相信的，对于革命抱怀疑态度；其中派，因为感到今天的世界不如从前，必须比过去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对于革命能否成功有怀疑，不肯贸然参加，但绝不反对革命；其左翼，因为生活不断下降，“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是革命中颇要紧的一支力量。可是，到了革命高潮时，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不但左派参加了革命，中派也可以参加革命，右派在革命浪潮的裹挟下，也不得不附和革命。因此，各个阶级、阶层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个阶级、阶层对于革命的态度是会起变化的。第三，从各阶级的相互联系中，从国内革命形势和国际条件的相互影响中来分析各个阶级的变化。例如，小资产阶级的中派，本来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可是，由于“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所以，在革命高潮时，他们也可以参加革命。又如，工业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因为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再如，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一个中间阶级，根据他本阶级的愿望是要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随着本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际条件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是会很快分化的。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他们不是向左跑入革命派，就是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不可能永远“中间”下去，他们实现民

族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阶级愿望，也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再次，他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以后，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历史等基本观点，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等。例如，他根据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的原理，在分析中国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基础上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因而是革命的敌人；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因而是革命的主力；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是我们的朋友，因而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这就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解决了革命的敌友问题。既然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要推动我国社会的前进，就必须改变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因此，反帝反封建也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又如，他根据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历史的观点，又指出，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就要团结真正的朋友向真正的敌人作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并以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五卅运动和五卅以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以及各地的农民运动为例，说明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参加革命，才能完成中国民主革

命的历史任务。

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具体、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解决了革命的敌友这个首要问题。它不仅是一篇光辉的政治论文，也是一篇光辉的哲学论文。由于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著作，因此它的发表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标志。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在对湖南湘潭等五县农民运动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三月五日起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连续刊载。这篇文章彻底揭露并清算了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各种反革命宣传，有力地驳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热情讴歌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又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为了驳斥反动派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他指出，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能对农民运动有个正确的认识，才能给反动派的攻击以有力的回击；他继续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不同阶级、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深刻指出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议论、观感和态度，完全是由不同阶级、阶层

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他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分析，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民在农村进行反封建的革命，首先就要“把地主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最后，他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出发，总结了对待农民运动的三种态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同志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又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重要著作。由于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不久，而它们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运用和阐发上又互有补充，因此，同前一篇文章一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发表，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标志。

二、唯物辩证地分析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归于失败，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可是，就在全党批评、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却又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它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鼓吹所谓“无间断性的革命”，主张中国革命要急转直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而主张在全国中心城市组织暴动。在这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指导下，又使革

命遭到严重损失。

毛泽东同志不仅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而且反对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一月，他认真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著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特点，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又前进了一步。

（一）深刻分析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揭示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城市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乡村是封建的农业经济。中国革命的敌人在城市中的统治力量是强大的，而乡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中国革命就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必须走相反的道路，即首先在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行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积聚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同时，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所以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

市，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同志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深刻揭露了“左”倾盲动主义只讲一般，不讲特殊，生搬硬套外国经验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错误。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因果性范畴的原理，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驳斥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对象，他们各自扶植一派军阀，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同时，对中国又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此也就造成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是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但是，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也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在一定的必要条件具备了，才会有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二文中，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这些条件。即：（1）有很好的群众，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并能长期存在的地方是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2）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只有在中国革命形势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之间以及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加深、分裂和战争的继续，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

而不断向前发展时，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才是可能的；（3）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4）有很好的党，它能执行正确的政策；（5）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以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现实的因果联系，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也不会有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认识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只有认识了这些条件，才能正确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原因为什么会产生红色政权存在的结果。而右倾悲观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不懂得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他们把客观事物彼此孤立起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往往以片面代替全面，在发生暂时困难的时候，竟看不到斗争的光明前途，因而发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三）从世界观的高度深刻揭露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都是只看现象，不看实质，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主观主义。“左”倾盲动主义是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大了，而把反革命力量看小了，例如，“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①右倾悲观主义则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例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九年二月，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临到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却被这个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97页。

到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已十分露骨，蒋桂冯军阀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竟把这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地扩大起来，仿佛革命的前途未可乐观，而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因此，“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表现虽然不同，但其思想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割裂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说道：“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 这就告诉我们，要认识事物的实质，必须从分析事物的现象入手，事情的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又是相互联系，发展变化的，只有分析事情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发展变化，才能找到现象内部的本质联系，抓住事情的实质。

总之，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又找到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不仅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特别是矛盾分析观点的创造性运用，而且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更加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页。

三、在反对从本本出发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阐发了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广大共产党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深入农村，武装工农，党所领导的红色政权不断发展，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党和红军也有很大发展。但由于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红军的主体和红军中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又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所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到党内和红军中来；同时，红军中部分来自旧军队的官兵也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旧思想和旧作风，红军的建设一度受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严重干扰。为了从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同志曾经利用红军向赣南闽西地区分兵的机会，在寻邬作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并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深刻论述了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

（一）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作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要认识事物，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对事情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只有把事情的情况完全弄清楚了，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反之，遇到问题不调查，怕做艰苦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只是一个人或邀集一堆人在那里“冥思苦索”，以为这样就可以想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好主意，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红四军某些领导人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表

现，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他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又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些论述对于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教育全党，对于树立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二）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学习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但“本本主义”实际上就是指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迷信书本，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它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呢？为什么我们欢迎这个理论呢？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是什么“先哲”，天生的圣人，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实践斗争中已被证明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而本本主义则相反，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对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是什么“先哲”，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有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看法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另一种则“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生搬硬套书上的道理，根本不去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这是唯心主义的本本主义的态度，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我国的实际情

况相结合的原则不仅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指导原则，也是我们贯彻执行上级领导机关指示的根本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反对本本主义不是不要“本本”，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为了指导我国的革命斗争，学习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样，贯彻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在作出指示以前对实际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指示的内容是适合于革命斗争中的客观和主观等方面的情况的，同时，上级领导机关发布指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革命，是斗争所需要的。因此，在贯彻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时，必须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用上级指示来指导革命斗争的目的。用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上级指示，只会妨碍上级指示的贯彻，使党的策略路线不能深入群众，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革命斗争，因此，本本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加以纠正。

（三）分析了红四军中某些领导人的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进一步指出努力作实际调查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四军某些领导人离开实际调查的唯心主义已经在斗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因为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革命斗争，必然是空洞的、唯心的，而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不是产生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产生盲动主义的错误。例如，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情况不作实际调查，只看表面的现象，不看事情的实质。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大了，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必然要产生盲动主义的错误；反之，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又必然要产生另一种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都是

离开实际调查，从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产生的，它对我们的革命斗争妨碍极大。要洗刷唯心精神，防止和克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斗争任务。

此外，他还就社会调查的对象、目的、方法，以及调查的技术等作了论述，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用辩证的、唯物的观点指导社会调查的重要性。

四、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就遭到反动派的不断“围剿”。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以来，蒋介石在结束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后，连续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前三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同志指导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都迅速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但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红军中全面贯彻，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指导下，红军运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正确战略战术，不久也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又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妄图一举达到消灭红军的反革命目的。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历时一年，不仅打不破敌人的“围剿”，红军反而完全被动地在敌人日益压缩的堡垒线里打圈子。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

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的观点，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丰富经验，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基本原理，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述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及其发展变化，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毛泽东同志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① 从事战争的人，只有正确认识了战争规律，才有可能做到主客观一致，使战争的主观指导适合于客观的实在情况，在战争中多打胜仗，少打败仗。战争规律是客观的，但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客观的战争规律呢？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② 这就是说，必须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研究战争规律，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战争的规律；不但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为各种不同种类和性质的战争既然有其共同的东西，有其一般的规律，又有它们各自的特殊的东西，有它在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则除了一般战争规律和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更加特殊的规律。我们在中国从事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1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158页。

革命战争的人如果不懂得它，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者割裂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只承认一般规律，不承认特殊规律，并且把一般规律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永远适用的东西。他们不区分战争的性质，不懂得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规律；他们不区分战争的地域，不懂得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是不同的；他们也不区分战争的时间，不懂得不同的历史阶段，特点不同，战争规律也不同。这种以形而上学观点对待战争的机械论是必须反对的。要正确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就要看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要看到规律的发展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①又说："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分析了认识战争规律的过程

怎样才能正确认识战争规律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③亦即必须从实践中学习，从战争中学习。他还把认识战争规律概括为以下两个过程：

第一，定出战争计划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④这里说的就是定出战争计划的过程。正确的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署，即正确的战争计划归根到底来源于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它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首先，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广泛收集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例如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战斗布置、兵力配置等。其次，当这些材料收集起来以后，还必须对它们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联贯思索，以求在总体上对敌方的情况有所认识。再次，认识了敌方情况以后，再把我方的情况和它对比，研究敌我双方的相互关系，这样，就可以对战争的发展规律作出判断，对战争的打法定下决心，并作出具体的战争计划。毛泽东同志说：“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 在后来发表的《实践论》一文中，他把认识的这一过程称之为通过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详细论述是在《实践论》中完成的，但基本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已经提出了。他在论述认识的这一过程的同时，还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并指出粗心大意的军事家和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都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个是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一个则容易受敌人的欺骗和引诱，受部下不负责任的建议的鼓动，使军事计划背离客观实际。他们所坚持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而不懂得任何军事计划应该建立在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

第二，执行计划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①为什么执行计划的过程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呢？因为军事计划虽然是建立在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上，但这个军事计划是否符合于实际情况，在作出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必须把这个计划应用于指导战争，在战争中加以检验。事实上，在战争中部分地改变，甚至全部改变原定计划的事都是有的。因此，执行计划的过程也就是检验、修正、补充计划的过程。他在《实践论》中称这一过程为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也就是检验、发展理论的过程。鲁莽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认为人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因而也不懂得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不断修正原来的计划，只是一味蛮干，结果非失败不可。

上面说的认识战争规律的过程，是指对一个战略行动或一个战役行动的规律来说的。由于整个战争包括许多战略行动和战役、战斗行动，因此，要认识整个战争的规律，我们的认识就不能停留在一个战略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行动的规律上，必须随着战略行动或战役、战斗行动的推移，不断发展我们的认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全面认识敌我双方的情况，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不仅论述了认识战争规律的过程，还阐明了学习军事理论和从事战争实践的辩证关系，亦即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是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是经过流血牺牲的代价检验过的东西，我们应该尊重它，学习它。但这种军事理论毕竟还是过去流血的经验，它对于我们也只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因此，还必须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有自己流血的经验，有了自己从事战争实践的直接经验，才能更好地鉴别间接经验，吸收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拒绝那些对我们无用的东西，增加那些它没有而应该增加的东西。如果没有自己从事战争的直接经验，势必对过去的军事理论不加鉴别地照抄照搬，把它削足适履地运用于指导当前的战争，这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因此，我们固然要从书本上学习军事理论，更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只有在自己的战争实践中懂得了战争的规律，才能更好地学习书本上的军事理论，使书本上的军事理论为当前的战争实践服务。所以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①

（三）根据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具体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揭示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都是以它为指南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应该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把它照抄照搬到中国革命战争中来。我们在中国条件下从事革命战争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应该懂得中国的革命战争是有许多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的，因此，学习苏联内战的经验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不同于一般战争的特点，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的不同情况。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第二，是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军队在武器、装备和数量上都远远胜过红军，而且它掌握着全国性的政权，又得到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第三，弱小的红军，中国红军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建立的，不仅数量少，武器差，物质供给困难，也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我们的政权是分散、孤立的山地或偏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外间援助等；第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得到了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而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由于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总之，以上四点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这四个特点存在着本质联系，第四个特点就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两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则成为尖锐的对比，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也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两方面，前者是顺利条件的方面，后者是困难条件的方面，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其他规律都是从它发生出来的。

（四）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阐述了革命战争的辩证法，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第一，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自从有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来产生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中国革命战争则属于正义的战争。战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随着人类社

会的发展，它终久是要被消灭的，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从事这个战争，就是为了通过战争的斗争形式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人类进步到消灭了阶级和国家的时候，什么战争也没有了，既没有非正义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用战争消灭战争的辩证法道理，他们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者，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不敢用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这只能纵容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屠杀广大劳动人民。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出于消灭一切战争的愿望，才能懂得用战争消灭战争的深刻道理，并用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争取人类永久和平时代的早日实现。

第二，战略和战术。战争是全局和局部的统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因此，在战争中，研究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为了阐明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毛泽东同志首先论述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全局就是指它包含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有机统一。局部则是指全局中的某个方面、某个阶段。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②全局不能离开局部而独立存在。离开了局部就没有全局；反之，局部是全局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它是隶属于全局的，也不能脱离全局而存在。可见，全局和局部是统一的，互相联系的。但除了统一的一面外，还有对立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一面。由于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因此，它高于局部，统率局部；而局部虽是全局的组成部分，但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往往不能适应全局的要求而出现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当这种矛盾出现时应如何解决呢？由于全局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局的利益决定局部的利益，全局的命运决定局部的命运，所以，必须树立全局观点，当全局和局部发生矛盾时，应努力克服局部的“缺陷”，使之适应全局发展的需要。在克服局部的“缺陷”时，必须注意抓住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应该看到有些局部对全局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有时候，这些局部的失败对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可是有的局部就不同,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指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它是全局的中心环节或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说：“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①所以，在克服局部的“缺陷”时，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即主要矛盾，就能带动其他局部，即次要矛盾的解决，更好地适应全局的需要。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如此，就不难理解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了，战术必须以战略为指导，它是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又必须通过战术来实现，“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主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它的问题或动作上。”②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

另外，毛泽东同志还论述了“围剿”和反“围剿”、防御和进攻、退却和反攻、运动战和阵地战、歼灭战和击溃战等等的辩证关系，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机械论观点，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不仅是一篇重要的军事著作，而且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全篇闪耀着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光辉。这篇著作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上，或者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这篇著作的写作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才有可能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起来，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因此，这篇著作也就为从哲学上全面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好了准备。

第四节　《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曾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和挫折。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占了统治地位，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正轨。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正经历着重大变化。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红军长征到达陕

北以后，为了迎接新的抗日战争的斗争任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大量工作，其中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从理论上、思想上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教育全党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从而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为此，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从思想根源上划清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而且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实践论》、《矛盾论》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毛泽东同志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世界观上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和阐发。他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许多著作，除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某一个方面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路线的世界观根源，研究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方面的基本理论外，也为从哲学上全面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作了必要的准备。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工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参考了李达、艾思奇等人以及国外学者的许多哲学著作，在过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专著。这两篇著作

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揭露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根源，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哲学上总结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

《实践论》揭露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系统地阐发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道路，以及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等一系列重要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于机会主义的唯心主义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毛泽东同志重点揭露的是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所以，这篇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著作题名为《实践论》。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多次出现过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又出现李立三的“左”倾；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又出现王明的“左”倾路线长达四年的统治。其原因何在？毛泽东同志认为主要原因是在世界观上没有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为了克服和防止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危害，必须深刻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对全党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为此，毛泽东同志继《反对本本主义》之后，又写了《实践论》。那末，他在《实践论》中阐述了哪些认识论原理？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一）对实践的内容作了新的概括

关于实践的内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指出即实验和工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给奥·倍

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也指出，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也阐述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同时还说道：……“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①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党内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继承了上述思想，对实践的内容作了新的概括。他一方面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②，社会实践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包括人们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活动；另一方面，为了批判割裂认识和实践关系的教条主义，又密切联系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指出基本的实践活动有三种形式，即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他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又说：“……各种形势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把这三种社会实践明确地规定为实践的三项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可以帮助人们抓住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更好地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掌握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

（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虽然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但并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加以论述。鉴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机会主义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0页。

②见《实践论》。本小节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实践论》。

路线割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全面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除了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外，还指出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量，他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只是到了伴随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人们才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他强调指出，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最后，还指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总之，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离开了实践，认识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发生，当然更谈不到认识的发展和判定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了。毛泽东同志对实践在认识中作用的概括，进一步丰富了列宁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大贡献。

（三）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概括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②毛泽东同志把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列宁的这一概括具体化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虽然不同，但又是互相联系的，它们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两个相互联系的认识阶段。一方面，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通过实践，获得大量的、可靠的感性知觉的材料，并通过抽象思维对这些材料进行改造制作，才能产生理性认识。另一方面，感性认识也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他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而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因此就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分析认识过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教条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看不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因而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联系。教条主义者轻视从实践中得来的感性经验，迷信现成的书本知识，不了解书本上的理论乃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以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去扼杀生动的实践经验。经验主义者则轻视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满足于自己局部的、片断的经验，认为它到处适用，而不了解感性经验的局限性，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以及把感性经验提高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满足于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不能通过客观过程的全体，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

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用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使之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所以，从整个认识过程来说，从实践到认识，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一个飞跃，而由认识到实践，即由理性认识再到革命的实践是又一个飞跃。由于用理论指导实践，可以把精神的力量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并且还可以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所以，"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毛泽东同志对认识发展过程的具体而深刻的分析，是他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研究认识论问题的成功尝试，也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

（四）揭示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关于真理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明确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批判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鉴于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否认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客观世界由于它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们对于不断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某一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才是绝对真理。他说："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它是总结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随着无

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并获得更大的发展。

（五）概括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他指出，就人们对于客观事物某个具体发展过程的认识来说，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就认识的总过程来说，由于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所以，实践——认识——实践的形式更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但它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无限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概括不仅说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也深刻地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以及认识不断深化的道路，并指明了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日新月异，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总之，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问题，它不仅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而且在对实践内容的概括，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系统阐述，对认识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以及对认识发展总规律的总结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是着重揭露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那末，在《矛盾论》中则是集中批判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形而上学世界观，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旧中国，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为要引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就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既不作具体分析，更谈不到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因此必然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失败。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矛盾，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深刻地说明和极大地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本书题名为《矛盾论》，原因也在于此。那末，《矛盾论》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一）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宇宙观

毛泽东同志继承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提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①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宇宙观，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提法的科学性是无用置疑的，因为宇宙观不仅要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还要回答世界如何存在的问题，而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见解正是回答后一个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考察了中外哲学发展的历史，指出形而上学思想无论在中国和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只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而辩证法的宇宙观，在中国和欧

---

①见《矛盾论》。本小节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矛盾论》。

洲的古代就产生了，由于它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作过很重要的贡献，但他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理论后，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可见，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同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宇宙观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这点不是偶然的，这是从哲学上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必然得出的结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机会主义者所以犯错误，就在于他们的宇宙观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为了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就不仅要批判机会主义的唯心主义宇宙观，而且还要批判他们的形而上学宇宙观，才能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全党对于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识别能力。

为了帮助全党划清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两种宇宙观的界限，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形而上学宇宙观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否认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引起的发展变化；认为如果有变化，也不过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变化的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内部，而是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但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这种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叫内因，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叫外因。它们的关系是：内因是变化的根

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学说。

（二）概括矛盾普遍性的两方面的意义，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的著名论断

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深刻的论述和分析，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矛盾的普遍性概括为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自终的矛盾运动。”这一概括不仅说明了物质世界存在的根本原因，也说明了物质世界不断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根据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毛泽东还着重批判了德波林学派否认矛盾普遍性的错误观点，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著名论断。他说：“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又说，“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必须学会运用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分析一切事物，不仅看到事事有矛盾，还要看到时时有矛盾，这样，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精辟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的物质世界和世界是普遍发展的原理，对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不仅有普遍性，而且“都带特殊性”。世界上所以有千差万别的事物，就是由于这些事物内部包含的矛盾都有其特殊性。“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

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事物的发展所以有不同的过程和阶段，就是由不同过程和阶段的特殊矛盾决定的。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是为了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同志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等。机会主义者不遵守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例如，他们不懂得我国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要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而企图在民主革命过程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左”倾盲动主义就鼓吹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胡说它“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地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提出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错误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损失。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在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上，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所谓主要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诸矛盾中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谓非主要的矛盾则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诸矛盾中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矛盾。这个主要的矛盾的理论是毛泽东总结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所引起的形势的新发展而最初提出的，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

务》一文中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矛盾论》中，对此又作了理论上的概括，认为区分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有重要意义，由于主要的矛盾是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因此，解决主要的矛盾就成为解决各种矛盾的关键。除了主要的矛盾一种情形外，还有主要的矛盾方面的一种情形。所谓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指矛盾的两方面中力量占优势、起主导作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次要的矛盾方面，是力量居劣势、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着起变化。为什么要研究矛盾特殊性的上述两种情形呢？因为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而不能懂得事物矛盾的情况，也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由于中日矛盾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就讨论确定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却看不到这种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竭力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主张。又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样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承认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不承认敌人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当时的反“围剿”战争看作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提出“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等错误原则，使反“围剿”战争失败。这两个例子说明，不懂得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分和联系，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这两种情形，就认不

清革命发展的新形势，或者看不到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反“围剿”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矛盾特殊性的这两种情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特殊性问题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列宁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深刻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作过专门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批判机会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斗争中，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列宁的思想，并指出，所谓同一性，是指以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题，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两方面中，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是更重要的。因为只有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必须看到，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条件变化了，同一性也要起变化。否认了同一性的条件性，也就否认了现实的、具体的矛盾。所谓斗争性，就是指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斗争。斗争性和同一性比较，是无条件的，是贯彻始终的。既然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它就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它就是绝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虽然不同，但它们又是不可分离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正由于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之中存在着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才推动了事

物的不断发展，构成了整个物质世界永不停息的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党内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同一性，不讲斗争性，这种脱离斗争性的同一性，只能是僵死的、形式上的、没有内在根据的同一。他们在统一战线中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一味迁就国民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样的统一战线只能是形式上的，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巩固的统一战线。"左"倾机会主义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这种脱离同一性的斗争，必然是乱斗一气，破坏事物的发展。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革命遭受损失。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矛盾的斗争性虽然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矛盾斗争的形式却因矛盾性质的不同而不相同，而且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矛盾斗争形式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五）创造性地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

所谓共性是指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个性则是指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客观存在的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根据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统一的观点，从各个方面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不仅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而且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事物内部矛盾

的每一侧面又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的斗争是无所不在的，不论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存在着斗争，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条件具有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同一性，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总之，客观存在的任何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统一。

既然客观存在的矛盾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统一，那末，要正确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就必须以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为指导，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相互联系。拿认识矛盾来说，既然事物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包含了共性，共性也就是一般，个性也就是特殊，那末，人的认识运动也必须是从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人们总是通过实践，首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在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以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进行概括工作，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的、一般的本质，这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性的、一般的本质以后，又可以运用这种对共同本质的认识作指导，去研究更多的、更广泛的各种具体事物，找出它们的特殊本质，使原来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人的认识总是按照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循环都使人的认识提高一步。如果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违反了认识发展的上述辩证规律，就不可能认识任何事物的矛盾。又拿解决矛盾来说，既然事物的矛盾是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统一，在解决矛盾时就必须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否则，解决矛盾也就成为不可能。

根据以上所述，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不可能认识矛盾，也谈不到解决矛盾，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党内机会主义者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者，他们从不同方面割裂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相互联结。教条主义者只讲普遍性，不讲特殊性，他们满足于书本上的一般原则，不愿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这种脱离了特殊性的普遍性，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理论。经验主义者只讲特殊性，不讲普遍性。他们看重自己的局部经验，把它看作是普遍适用的，而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这种脱离了普遍性的特殊性，必然以局部代替全体，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总之，他们违背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原理，不可能认识任何事物的矛盾，更谈不到正确解决矛盾，必然把革命事业引向失败。

《矛盾论》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直接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而对矛盾的特殊性、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等原理的提出和论述，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实践论》、《矛盾论》发表的重要意义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了，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如果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光辉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标志，那末，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斗争实践，其中包括多次失败的沉痛教训，直到《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成功地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从而产生了系统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不能说不是一件大事。从实践上说，《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即从国内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这时虽然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鉴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沉痛教训，为了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克服和防止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全党，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教育。因此，《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不仅是过去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新的斗争任务的需要。“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又是为了指导尔后的革命斗争。自从有了以《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思想为代表的系统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革命才有了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导，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取得的。所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在实践上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简短的结论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并日益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时期。中国的社会情况既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必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成功地运用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的标志。由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十分错综复杂，而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又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革命斗争在发展，体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指导尔后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不仅经受了严峻的检验，而且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继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全面发展

（1937——1949）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内容极其丰富多彩的时期。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用和普及。在延安，他用很多时间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其他哲学著作，并亲自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住在杨家岭的一段时间里，他每星期三晚上召开由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哲学座谈会，推动干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热潮初步形成后，他倡议成立了新哲学会。在解放战争中，他坚持彻底地批判的革命辩证法，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斗争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总的特点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

的建设等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更系统、更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节　开展整风运动，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个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运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逐步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就思想方面讲，在国际教条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党内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产生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的极坏的主观主义作风，在党内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这种主观主义在组织上表现为宗派主义，在文风上表现为党八股。如果不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

阶级思想的斗争，不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就不能继续前进，就不能打破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因此。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领导革命前进中必须抓住的一个中心环节。

毛泽东同志为整风运动规定了内容、任务、方针和方法。他把反对主观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整风的中心内容。他说："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①这是党的思想建设中最重要的工作。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等重要文献，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点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在共产党内，不少人口头上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但是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却并不能真正坚持唯物主义，而常常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揭露了党内主观主义在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等方面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对现状、历史和理论这三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和主观主义态度的尖锐对立。他谆谆教育全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5页。

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①他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论主义的科学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响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这个解释为我们指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路线。

为了在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优良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为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以后又为"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科学的态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作为共产党的根本作风，这就把我党的思想路线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基础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革命实践中永葆青春，把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贯彻到共产党的全部活动中。

毛泽东同志指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理论”研究上，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他向全党大声疾呼：“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

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客观情况，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根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②

历史证明，经过周密调查制定出来的战略方针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二、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后，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的，毛泽东同志是这个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伟大斗争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九三八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一九三九年十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里，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公式，并着重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的时候，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某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条而不注重它的应用的情况，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因此，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留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他对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是对轻视实践、不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教条主义的有力批判，为革命人民如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

为了扫除党内一部分人对什么是知识、理论的糊涂观念，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说明了理论与实践、感性知识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与理性知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还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②理论来源于实践，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理论脱离了实际，就走向自己的反面，变为僵死的空洞的教条。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阶段。"③书本上的知识是前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总结，人们学习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否认学习书本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轻视前人所获得的知识，是一种十足的狭隘经验论，但应当了解，对于没有实际知识的人来讲，这种书本知识是片面的知识，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知识的人，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具有很多经验，但缺乏理论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这种经验也是感性的、局部的和不完全的。如果他们轻视革命理论的学习，满足于自己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作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那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它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他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4页。

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的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论述，对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

要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必须重视和提倡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面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又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②为此，毛泽东同志整理出版了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作的农村调查，并写了序言和跋，作了《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的讲话。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全党调查研究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发展了调查研究的理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一再强调深入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为我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时，总是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征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以求尽可能达到主客观相一致。他经常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说：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一定要请教群众和下级，“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①这就表明，搞不搞调查研究问题，实质上是走不走群众路线问题。

他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②，也是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他具体论述了调查研究中的认识过程。他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的概念，这是一般的、笼统的认识。第二步用分析的方法，对观察对象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仔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各部分加以综合，得出对对象的完整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科学的认识，它不同于开始时的认识。他指出：“这里特别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③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也有分析，两者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他还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9页。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1982年版。

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①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调查研究中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特点的典型材料。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东西丢了，那仍然没有发言权。要善于分析，也要善于综合，不要陷于狭隘经验论。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的过程，就是分析和综合的过程。

毛泽东还指出，要作好调查研究，必须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广大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是知识的来源。他们能提供闻所未闻的知识，他们是最好的老师。他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②这是毛泽东同志切身经验的总结，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

为了取得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干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对党的历史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历史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主义，具体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内的路线斗争，特别是分析了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表现，分析了党内产生错误路线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决议》不仅是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文件，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文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象《决议》这样全面系统地分析党内两条路线在思想上（认识论）的对立，分析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统一，调查研究等问题的论述，把在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活动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具体化了，把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从理论领域推进到实践领域。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四、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阐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研究和总结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特别是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经验，以便澄清当时文艺界的许多糊涂观念，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力地驳斥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阐明了革命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指出文艺为谁服务是文艺的根本问题，论述了文艺批评中政治和艺术

的辩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提出实践是检验文学艺术的标准。总之，《讲话》是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阐明了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他指出，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是流，而不是源。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文艺来源于生活，这就同一切唯心主义美学理论划清了界限。他又指出：文艺和生活，"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② 文艺把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的、平淡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所以文学艺术的美又高于生活的美，又反转来促进社会生活，鼓舞人民创造新的美好的未来，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否认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美高于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美，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和机械论。

在《讲话》中，他进一步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观点，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势的文学艺术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遗产，批判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文艺创作的借鉴，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继承和借鉴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为了今天的现实生活。必须反对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检验文艺作品政治上的好坏和艺术上的高低的标准是社会实践。他说：文艺作品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①好的动机和好的效果是分不开的。有好的动机，但无好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它的宣言，而是看它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②动机与效果也会发生矛盾，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也可能发生错误。但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这样的动机就不是真正的好心。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③这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同志的上述分析，解决了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即关于动机与效果的问题。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0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还论述了世界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指出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努力改造世界观，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驳斥了“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的谬论。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① 马克思主义要破坏的是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否认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哲学与文艺的关系的论述，也适用于哲学与其他科学的相互关系，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二节 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揭示了战争的发展规律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为了正确指导抗日战争，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以极大的精力研究战争问题和战略战术问题，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等光辉的军事著作。解放战争时期，又根据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和过去我们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等著作和电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同志这两个时期的军事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战争问题，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杰出范例。因此，这些著作同样是重要的哲学著作，是战争哲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论持久战》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奏，那末，也可以说，《论持久战》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续篇。

一、客观地全面地考察战争，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认识论的辩证法

如何考察战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应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发展来考察战争，着重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在《论持久战》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这就告诉人们，唯物辩证法是考察战争问题的唯一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战争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机械论（即形而上学）的尖锐斗争，这就为如何考察战争指明了方向。

所谓"客观的、全面的观点"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具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4—415页。

体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发展的趋势。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①根据这一中日战争总的特点，他进而具体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是强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处于垂死没落的时代，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它又是个小国，人力、物力不足，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在国际上它失道寡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然而中国是处于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它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它又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在国际上，它得道多助。他对中日双方的特点进行分析和综合之后指出，敌强我弱，我不能速胜，具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扩大；反之，我之优点可以因我之努力而增强，我之缺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克服。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持久性长期性，是抗日战争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

在分析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他说，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②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犯错误。他指出，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看作全部的论据，而忽视了其它的矛盾。他们的看法是片面的，也是主观的。速胜论者或则忘记了强弱这一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它矛盾，或则夸大中国的长处，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速胜论者看问题的方法同样是片面的、主观的。

在运用辩证法时，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为了彻底驳倒亡国论，他不是一般地、抽象地指出日本的退步和中国的进步，而是联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特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同英灭印度时期的英国不同，而且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也不同，此时的日本是处于法西斯国家崩溃的前夜，因此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也不是普通的、一般的进步，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于阿比西尼亚。他说，今天的中国，已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数十年的革命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在国际上，中国又能得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世界上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的支援。因此，中国决不会灭亡而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中日战争的分析，深刻揭露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根本规律。真理是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对事物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揭示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把握客观真理所必须遵循的方法。《论持久战》

为如何进行这种分析，树立了榜样。

在分析中日战争时，毛泽东同志从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注意区分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和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从而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本质。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开始时的强大是暂时的因素、表面的现象，而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则是经常性的、本质的因素。这是日本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中国在战争开始时期的虚弱是暂时的因素、而中国进行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则是经常起作用的、本质的因素。这是中国最后胜利的主要依据。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得到美帝国主义全面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四百万军队，他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①在考察战争以及其他事物时，若不能区分现象和本质，不能区分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和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很容易为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抓不住事物的本质，迷失了方向。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还以辩证法的变化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发展，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可能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一)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三)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在每一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时，他不仅区分向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0页。

的变化和向下的变化，而且还区分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区分新的量和新的质的变化与旧的量和旧的质的变化。他指出：中国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文化机关等）是旧的量和旧的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是新的量和新的质，主要表现在质上。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是关于量和质的辩证法思想在分析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他又根据不同阶段敌我力量的变化，规定了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并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针对党内外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反复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由于游击战争的战略不同于一般战争的战略，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的东西，又不能机械地移用于游击战，为此他专门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一著作中，他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吸收了历史上游击战争的教训，从六个方面〔即：(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深刻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揭示了游击战争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是军事发展史上系统而完整的阐明游击战争理论，揭示游击战争发展规律的第一部著作，

也是唯物辩证法在游击战争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战争的矛盾运动，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规律，批判了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阐明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说过："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暴力）方式的继续。"① 他还对德国战争哲学和战争史作家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名言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这一原理，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目的达到，战争就结束。战争过程始终贯串着政治。"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② 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把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把战争孤立起来的战争绝对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战争又有其特殊性，战争不等于一般政治，战争是政治特殊手段（暴力）的继续，是政治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有它自己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60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否认战争的特殊性，把战争完全等同于一般政治，也是错误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政治。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①因此在抗日战争中任何忽视政治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他反复说明抗日战争中全军全民政治总动员的意义，指出，只有实行全面的人民抗战路线，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反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只能导致抗日战争的失败。朱德同志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也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就不能有正确的军事方针。""离开政治，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显然是不正确的。"②胜利的人民战争，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方针指导下才能取得。

在论述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同志还分析了坚持抗战和政治进步的互相关系，阐明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他说："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③他又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能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是正义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447页。

②《朱德选集》，第136—13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4页。

开辟道路。历史证明，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还分析了革命与战争的内在联系，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①他提出，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一切战争。在驳斥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时，他说："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②只有经过战争才能消灭战争，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仍然不了解放手发动农民、武装农民、进行农民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的右倾观点，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阐明了革命与战争的关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由于他们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因此，中国革命不是顷刻可以胜利的，而是长期的和残酷的，不是先夺取城市后占领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所以，战争也是和平的继续，和平也是战争的继续。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① 把战争与和平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者只是相互排斥，毫无联系，不能互相转化的观点是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停止了，国内战争转化为国内和平。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的战争与和平呈现极为复杂的情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全面性的大规模内战还有困难，于是实行和平欺骗和准备内战的反革命两手。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指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国民党的方针是要打内战。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国民党的力量，所以内战危险严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也存在着制止内战，出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来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的革命策略：一方面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揭露反动派的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号召全党，提高警惕，把工作的重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放在壮大人民力量上，随时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性内战。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他一方面批评了忽视争取和平、反对同国民党谈判的“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害怕战争、幻想和平的右的倾向。指出和平的取得主要是依靠人民的斗争，而不能依靠和平谈判。绝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为了和平，可以放弃人民武装，可以放弃人民战争。他说：“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①

国内和平与国内战争是这样，世界和平与世界战争也是这样。世界和平的取得，只能依靠各国人民共同的革命斗争。

三、论述战争中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客观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还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在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既反对唯心论，又反对机械论，要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在《论持久战》中，他进一步阐明了战争规律的特殊性、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指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5页。

性，带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①，是有规律可循的。用战争这种社会现象的特殊性来否认战争规律的客观性是完全错误的。战争的特殊性，使人们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认识敌我双方，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但是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通过各种侦察手段，通过正确的分析、判断和推理，还是可以知其大略，知其要点的。战争具有流动性，战争的计划很难完全固定，它随着战争的运动而变化，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否认战争的流动性，否认战争的计划或方针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加以变化、修改，就是战争的机械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不确实性，从根本上否认战争的相对确实性，战争规律的可认识性和战争计划或方针的固定性，就会陷入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唯心论的同时，着重阐明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②这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人类自觉能动性的科学含义，同唯心论和机械论划清了界线。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同志又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称之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①

人类的自觉能动性的特点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性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势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唯物地指出，战争中的主动和被动是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唯心论。另一方面，他又辩证地指出，战争中的优势劣势本身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实，必须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才可能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战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在客观因素具备着变化的可能性时，主观的努力起决定的作用。否认这一点，就是机械论。因此，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发扬正确的自觉的能动性，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决不是可以离开客观条件而轻举妄动，乱碰乱撞。认识战争客观规律，作到主观与客观相符是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前提。他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③在论述战争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时，他又说：“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的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①必须坚持反对离开客观条件的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任何离开客观物质条件，离开对战争规律的认识，离开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决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性，而是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其结果，只能把战争引向失败。

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必须正确认识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反对唯武器论这样一种机械论。他指出，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②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原子弹吓唬人，革命队伍中有的人也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③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都迷信武器的优势，而一切革命的军队的武器在开头总不如敌军的武器，但在历史上却总是武器差的革命军队战胜武器好的反动军队。毛泽东同志对唯武器论的批判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用差的武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美蒋反动派。

毛泽东同志批判唯武器论，并不否认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不仅影响到军队战斗力的强弱，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8—1139页。

而且影响到军队的编制和战略战术。他认为游击队发展到正规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装备上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他还指出："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①否认武器在战争中重要作用，同样也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是落后的愚蠢的思想，是战争问题上唯心论的表现。

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只是发挥少数指挥员的主观指导作用，最根本的是要充分发挥全军全国人民的自觉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能动性"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扬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类自觉能动性的科学定义，关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关于如何才能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以及对唯武器论的批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四、创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中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其战线之长，战场之广大，双方参加战斗人员之众多，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客观辩证法和指挥战争的艺术得到最充分、最活跃、最生动的表现。

根据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抗日战争以来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解放战争时期，又根据战争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同志创立了完整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他的军事辩证法中极为重要、极为精彩的部分。

毛泽东同志把战略战术的理论牢固地放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决不是任何天才统帅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想象物，而是由战争双方的特点所规定的，是对战争实际情况的反映。他指出，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特点，规定着双方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这就同指导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划清了界线。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作战计划，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必须随着战争过程的推移而改变或修改自己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而在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变了，作战方法也随之改变，解放军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军队必须善于按照具体情况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又同指导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划清了界限。

朱德同志在总结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我们用兵的

主张，可以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①

毛泽东同志指挥打仗，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审势度时，不拘一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他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每一条都贯彻着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他明确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战争的本质。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串于战争的始终，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它。战争的指挥者不能离开战争的目的去指导战争。他用辩证法阐明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②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但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进攻的一种手段。所以防御也不能废弃。在战争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他还指出：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同保存自己一点也不矛盾。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这两者之间是相反相成的，是对立的统一。依据中日战争的特点，毛泽东同志生动地揭示了中日之间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分析了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

①《朱德选集》，第16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5页。

等等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奇异状态。他提出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二阶段，我们应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方针。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造成了日本采取战略进攻，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日本企图采用战略速决，我们采用战略持久，日本进行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但日本兵力不足，我国则土地广大、人多兵多。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原，其余部分无法占领，这就给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给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之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于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我处于战略上的内线和防御，然而，我用几路对他一路，用数倍于他的兵力包围他，这样在战役战斗上，敌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则变成外线和进攻，并实行速决的方针。他还指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是相反的，然而，实行这样的战略方针又是必要的。这就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就是战略与战术、内线与外线、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之间的具体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战争过程中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对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论述了兵力运用上的集中与分散之间、战争指挥上的集中与分散之间、战争的计划性与流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各自的特点、作用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之间的对立统一，等等。这种对战略战术中一系列范畴的辩证分析，是抗日战争中活生生的客观矛盾运动的反映，是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在指导战争过

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它进一步丰富了对立统一规律。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的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总结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阐明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批判了军事平均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情况的变化，八路军、新四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他又指出，要改变敌之相对的战略优势和主动，我之相对战略劣势和被动，其方法也是靠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着。解放战争时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仍是战胜蒋介石的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但在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时，必须依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时，必须应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时，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军兵力多，敌军兵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时，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就不应同时攻击几个方面的敌人，只能一个一个地加以消灭。如在解放战争中，由于实行了这种作战方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随着战争的推移，经过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我军由局部优势和主动，转变为全面的优势和主动，直到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解放全中国。由此可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反映了人民战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最后胜利的客观规律，是量变质变的辩证法思想在指导战争过程中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出：游击战"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

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①在抗日战争中，他反复阐明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的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不仅表现在与正规战的配合，而且表现在游击战发展为正规战，游击军提高为正规军。他指出，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军由国内的正规战转变为抗日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我军又有抗日游击战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的正规战。与此相适应，我军存在着由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游击队，再由游击队、游击军转化为正规军的过程。正规战——游击战——正规战，正规军——游击队、游击军——正规军，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军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军，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重复。

根据中日双方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所谓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②运动战的特性之一，就是流动性，它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为了歼灭敌人，往往要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部分城市和土地，把敌人放进来打。他指出：“诱敌深入”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③在运动战中，毛泽东同志既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又反对“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他特别指出，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常是惧怕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6页。

丧失土地，不懂得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为了全部地永远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为了保存军力，英勇战斗于前和放弃土地于后，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是相反相成的。拚命主义者明知自己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是城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拚命主义者不懂得同战争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而不是直线的。为了驳斥战争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直线性，毛泽东同志生动地说明“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①。

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强调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用，但并不否认必要的阵地战。在抗日战争时期，阵地战始终处于辅助的地位。但他仍认为，随着中国军队技术装备的改进，新式武器的增加，在战略反攻阶段，阵地战的地位无疑将提高。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仍以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但随着部队技术装备的改善，炮兵和工兵的建立和加强，夺取城市的阵地攻坚战就逐渐提到重要的地位，把大规模的运动战与阵地战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完整理论，以及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相互关系的论述，反映了战争的流动性和战争发展道路的曲折性，揭示了人民战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他还指出，我们的敌人虽然熟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知道人民军队的作战方法，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但却毫无用处。因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实行这种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又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这充分体现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和证实。毛泽东同志根据每个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决定每个战役全局的关键问题，确定不同的作战方向和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密切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消灭敌人的整个兵团密切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密切结合起来，把用战斗来消灭敌人和瓦解敌军、和平改编敌军结合起来，使我军战争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大战役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战争指挥的杰出范例。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理论和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民军队在同国内外敌人的长期作战的实践中产生的，它反映了人民战争的一般规律，其基本精神仍适用于未来的反侵略的人民战争。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把十大军事原则看作是人民战争战术的“顶峰”，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科学真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在这期间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三节　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

盾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批判了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等问题上的各种反动观点和错误倾向，提出并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及时地将革命引向了彻底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一、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论述，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新旧两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前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从时代的特点出发，论述了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

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经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他还指出："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①

毛泽东同志还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标志。他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②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所不可能出现的。因此，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③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否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建立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不了解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的不同，急于超越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企图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犯了“左”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上述两种错误，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社会主义的因素，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就其整个社会性质来讲，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买办资产阶级，革命的锋芒只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决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民族资产阶级仍有可能参加革命，是革命可以争取的同盟者。这个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建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这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是"走历史必由之路"。①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去完成，企图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这种人"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有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性质的不同，不能混淆，但它们之间也有联系，在它们之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③因此，在新的国际条件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必须而且也完全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时，决不能忘掉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决不能忘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要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为革命转变准备条件，并在条件具备时不失时机的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

后一个革命过程。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在条件具备时必须将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容许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主张革命是分阶段的，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任务才有可能去进行下一阶段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还阐明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根据和条件。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①这就是说，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打碎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报告及时提出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和完成这个任务的各项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阐明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内在根据、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这里所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主要矛盾。这就给我们指明了革命转变的基本原因，说明了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当民主革命胜利之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由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让位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矛盾转化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转化，因而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同时，革命的性质也必将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内在根据。

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还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指出了革命转变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诸如没收官僚资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逐步地谨慎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即通过组织各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等等。

实践表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

二、把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确立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斗争，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不仅必须注意区分同盟者和敌人，而且要区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把力量集中在反对主要敌人上，决不能同时反对几个敌人，更不能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还要善于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通通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国内外极端复杂的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全面的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并据此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把中国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不懂得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懂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不懂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和帝国主义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也有矛盾可以利用。他们不善于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不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因此，他们不懂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必须牢牢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否则就容易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致不能正确观察形势，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政策。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至1940年春）和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之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就认为国民党的反动高潮是"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破裂。毛泽东指出，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中日民族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矛盾。他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①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决不会变动的。

应当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国内国际阶级关系的变动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主要矛盾这个概念的。三个月后，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他在《矛盾论》里对主要矛盾的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战略战术的重要方面之一。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既是主要矛盾理论的最重要的来源，又是主要矛盾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充分地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创造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9页。

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阶级投降主义，反复阐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十八年来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规律。特别指出：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反对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统一战线的“左”的关门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他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右的投降主义错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把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上。

毛泽东同志对统一战线内部的状况作了左、中、右的阶级分析，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顽固势力。并提出共产党的任务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为了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抗日战争时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利益所在，因为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只有高举民族的旗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领导人民，团结人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在这个斗争中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一致性的表现。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利益。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让步，因为没有双方的某种让步就不可能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但这种让步不是消极的，任意的，而是积极的，有限度的。加入统一战线的任何政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保持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这样才有利于合作，有利于统一战线。如果只讲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只讲合作，否认照顾各阶级的利益，合作就变成了混合，必然要牺牲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①在统一战线内部实行有限度的、必要的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妨碍统一战线，相反，这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是坚持抗战所必需的，这又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②这就是说，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就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 只讲民族斗争、否认阶级斗争，只讲统一性、否认独立性，或者只讲阶级斗争、否认民族斗争，只讲独立性、否认统一性，都是片面的，都是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统一性与独立性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的表现。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统一性和独立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和斗争呢？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实行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实行的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方针。这两种极端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重大的损失。鉴于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提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方面的政策。"② 所谓联合，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阶级、阶层、集团，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极不稳定的同盟者，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所谓斗争，就是对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依照他们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同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至军事上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从联合、团结中看到了矛盾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和斗争，又通过斗争来达到联合和团结。这就既反对了只看到联合、团结，看不到矛盾和斗争的右倾错误，又反对了只看到斗争，看不到联合和团结的“左”倾错误，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毛泽东同志特别详细地论述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情况。他指出，我们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顽固派的反革命两面政策，即实行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上，实行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的方面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在反共方面，实行对他们尚不愿意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在他们对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他还指出，对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也应加以区别，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即实行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根据历史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了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他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是极端仇恨和残忍的，任何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被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如前所述，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仅是保存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所必须，而且也是迫使顽固派继续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所必须的。但这种斗争应当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不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认为斗争会破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都是把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其结果必然是或者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错误，或者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错误。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内必须同时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在芦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还未抗日，统一战线还未形成，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芦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已参加抗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形成，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投降主义。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时，毛泽东同志总是在反对某一主要倾向的同时，提出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这样可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片面性。

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对国内国际关系的具体的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以及对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联合和不同的斗争，等等，都是唯物辩证法在政治斗争中的杰出运用，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中国将要诞生了。但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在这个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怎样？这个国家的内外政策如何？发展前途是什么？这是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给以明确的回答。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驳斥了国内外反动派的诬蔑和攻击，抨击

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存在的错误观点，答复了一些国际朋友的关心或疑问，提出和完整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他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根本经验，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准确鲜明的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首先，他深刻地论述了阶级专政同阶级消灭、国家消灭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②这是人类社会的远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阶级的消灭和政党、国家的消亡是一个过程，是要有时间和条件的，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后，还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为消灭阶级、实现国家消亡创造条件。不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共产主义者。

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竭力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歪曲国家的起源，宣扬政党和国家的永恒存在，抵抗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无政府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和绝望心理出发，希望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消灭国家和一切权威，这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全世界共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5页。

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①阶级、国家、政党都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恒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就针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消灭国家权力”为借口来阻挠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诞生的企图，鲜明地指出，我们是要消灭国家权力的，但是现在“还不要”，“还不能要”，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从长远看，阶级、政党、国家是要消灭或消亡的；从现实来看，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又必须加强。想要消灭它，必先加强它，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其次，毛泽东同志严格划分人民与敌人、革命派与反动派的界限，正确规定了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人说，对帝国主义“你们太刺激了”。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是这样，不刺激也是这样，因为它们是反动派。只有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才能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这也就是说，只有划清敌我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5—14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3页。

界限，才能判明谁来革命，革谁的命；谁来专政，专谁的政；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应用阶级分析法，规定了各阶级在人民的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领导力量。“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①而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对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可以同它建立政治联盟，但不能让它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不能让它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③

再次，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历史上一切国家的共同本质和各个不同阶级的国家的特殊本质，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毛泽东同志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④这是一切国家的共同本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5—141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3页。

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具有这个共性外，还具有同以往剥削阶级国家不同的特殊性。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对绝大多数被剥削者所施行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是多数的被剥削者对少数反动的剥削阶级所施行的专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专政，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专政，是新型的国家政权。他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① 这就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的专政同反革命的专政、革命的暴力同反革命的暴力的根本区别。历史的辩证法证明：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专政必须用革命的专政去推翻。反动派竭力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是"独裁"、"极权主义"等等，毛泽东同志严正地回答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又说："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他在论述革命专政与反革命专政具有根本不同性质的同时，还精辟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把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高度地结合起来。他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② 只有对敌人专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只有对人民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人专政；对敌人的专政越坚决，人民的民主就越有保障；对人民的民主越充分，对敌人的专政就越彻底。这就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提出了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概念，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结构和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国家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四节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是共产党如何领导群众、组织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创造，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所面对的革命任务极其复杂，所涉及的部门和方面甚多，所管辖的地区广大而又分散。艰苦的斗争环境，复杂众多的革命工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特别讲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同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的。这对革命的发展妨碍极大。因此，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①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一贯注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还在土地革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命战争时期，他就发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要求党的一切干部必须抛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采取具体的、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

前面已讲过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等等，既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也为创造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彻底反对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根据新的情况、新的经验，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等著作。这些著作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领导中国革命数十年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结晶，是闪耀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光辉的杰作。

一、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把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规律运用于领导工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②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它既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它反映了共产党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基本观点。

从群众中来，也就是从实践中来，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正确的领导决不是从现成的书本上抄来的，也不是少数人关在屋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它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符合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人应当热爱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要不耻下问，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尊重唯物论，尊重实践，首先要尊重群众。脱离了群众，也就脱离了实践，在认识上必然陷入主观主义，在政治上必然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都是脱离群众的。

群众的意见是分散的、无系统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经过科学的抽象，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回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群众革命实践的过程，是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领导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千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5页。

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被群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都要坚持。凡是不符合群众的要求、为群众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应当坚决改正。在回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用恰当的方式宣传群众，引导群众认识真理，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①在这里既要反对落后于群众觉悟的尾巴主义，又要反对超过群众觉悟的命令主义。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就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它做到了发挥群众和领导的两个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时必须采用的方法。"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②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积极的、中间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并依靠他们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做好工作。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代替的党的重要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会议做决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2—12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定，而决不是由个人做决定。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相结合，这样可以少犯错误。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善于团结、依靠党委“一班人”，善于集中他们的智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不是委员服从书记的服从关系。注意集体领导，又要分工负责，做到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样，既能发挥集体智慧，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又能防止无人负责和贻误工作。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活动密切结合了起来，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关于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提出了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这个人类认识的正常秩序。根据这一认识规律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指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采用的方法。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一般是从同类的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本质，是共性。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可以使领导的意见、方针、政策能迅速地直接地与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可以广泛地普遍地动员群众行动起来。否认一般的普遍号召的作用，而满足于狭小范围和部门的个别工作，这是一种手工业式的狭隘的经验论。一般号召是在个别指导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产生之后，又必须回到个别指导中去，进一步检验、丰富和发展一般号召，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实际工作中，依据上级的指示进行一般的号召是容易做的，难的是深入的具体的普遍指导。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空洞的一般化的号召，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深入实际，进行个别指导的重要性。他说："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① 离开个别指导，不仅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不仅不能丰富和发展一般号召，而且使一般号召失去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和公式，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普遍的指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在没有取得具体的经验以前，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点上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一般号召必须与个别具体情况相结合，依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指导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上，他指出，要依据各种不同的地区而采取不同的方法，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的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他根据领导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①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他特别强调在不同的地区实施土地法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必须根据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的强弱，采取相应的步骤和方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防止"左"的急性病。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指出："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这样无限的循环往复，使领导和群众的认识与实践不断地进到高一级的水平，使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

三、关于"弹钢琴"和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

列宁曾指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善于在每个时期找出链条中的特殊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原理，提出了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想。他把这种方法形象而生动地比喻为“弹钢琴”。他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① 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和问题。在领导工作中切忌不分主次、轻重、缓急、先后，平均地使用力量或乱碰乱抓，造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在工作中不分主次地平均使用力量的工作方法，是一种否认矛盾不平衡性的形而上学方法。

每一地区和部门的中心工作，都必须依据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而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无疑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但各地的情况不同，具体的中心工作也有所不同。领导要善于依据每一地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分析各种工作在总任务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内的中心工作，安排好工作秩序，切不可根据某种公式机械地到处套用。中心工作是各种工作中带关键性的工作，抓住了中心工作就抓住了全局，就能把握住整个链条，以此带动其他工作，做到“纲举目张”。因此，领导应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能带动全局的中心工作上；对全局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是互相关联的。中心工作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其他工作也可以促进中心工作。抓紧中心工作，决不是可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以放松其他工作，忽视其他工作，而是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工作。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工作，不是可以放弃城市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相配合，革命就会失败。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工作方法》中指出：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①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不能只抓中心工作而忽视或放弃其他工作。把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对立起来，只抓中心工作的"单打一"的方法，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还十分注意运用数量和质量辩证统一的规律指导革命斗争，他提出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指出：要胸中有"数"。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它们的数量方面，"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辩证统一。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正确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质，而且要认识事物的量，从质和量的统一上加以把握。同一事物的数量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对每一具体事物来说，都有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数量关系是基本的，最能反映事物本质。因此，正确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一般的数量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关系，而且要从一般的数量关系中找出基本的数量关系，即要“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掌握事物的基本数量统计和主要百分比，对于认识事物本质，制定正确的政策，有重大的意义。

所谓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是一事物转变为另一事物的关节点。超过了这个数量界限，事物的性质就起了根本变化。在土地改革中，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实际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①有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量界限，就划清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这对克服和防止土地政策中“左”的和右的错误，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路线，极为重要。胸中有“数”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②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简短的结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期，是中国革命最活跃最生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的贡献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军事辩证法思想，社会革命论的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

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普遍地学习、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在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反复论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他娴熟地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完满地把彻底的革命辩证法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高度结合起来，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从理论领域推进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更加直接地、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所注重的是军事问题。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明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道路。在解放战争中，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为我军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行动纲领。军事辩证法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

在这一时期里，他出色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统一战线，具体分析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他对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里，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更加系统化了，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更加牢固的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它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

在这一时期里，他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实际工作，创造了一整套辩证法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它再次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客观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49—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开始，从此，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新时期的新特点，如何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既不能完全沿用民主革命的经验，又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独立地提出新的历史任务，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因此，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成功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节　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一、要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反对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要不要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成为中国当时面临的根本问题。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为了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中共中央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这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武装全国人民的思想，顺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后的新经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就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一定要在思想战线上表现出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了。因此，党的思想

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一切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能够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根据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进行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觉悟程度，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为此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了批判胡适等人的唯心主义的斗争。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超越现实可能性的“左”倾冒进和落后于现实可能性的右倾保守，都是主观主义。他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①他强调开会做决议、提方案、作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都要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注意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际总是相互分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超过客观实际，不顾主客观条件，在方针政策上、行动上盲目冒进，一味蛮干，把本来应该放在将来条件具备的时候才能办到的事，硬放到现在中来办；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能适应客观事物的发展，当客观事物发展到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的时候，他们还认为办不到，而不准办。总之，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9页。

急躁冒进或停步不前，都是主观主义，都必须反对。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一切革命者都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但是，只要干革命，犯错误总是难免的，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哪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这是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的。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错误。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国家的实际工作中，也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阐明了一系列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辉的思想，比如，他在阐述我国民族政策时，提出要尊重事实。汉族要承认少数民族落后是历史上造成的客观事实，但不能因此就歧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要承认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也是历史造成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不要因此就不信任汉族，搞地方民族主义。他要求汉族和少数民族都要在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的大目标下，批判实际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又如，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知识分子作了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估量和阶级分析。指出：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种种影响，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他们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别的什么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揭示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社会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领导者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任何个人的实践，和群众的实践比较起来，都不能不是狭隘的、片面的、不完全的。我们获得的胜利，就国内条件来说，就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也就是依靠了广大群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以后，由于我们党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的任务，又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就更需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反复强调，办事情，决定大计，一定要同群众商量。中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要有一段时间到下面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必要时，蹲下来，解剖一两个“麻雀”，进行分析研究。这种蹲点跑面、解剖麻雀、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要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要经常地深入实际，总结实践经验。要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就要亲自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艰巨而伟大的事业，也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成经验，需要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个矛盾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要想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坐着不动是不行的，必须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增长才干，总结經验教训，逐步地认识客观。

三、揭示真理发展的规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实践中，把对立统一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贯彻到各个领域中去，同时也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他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① “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②他明确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③当着某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会结束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的深刻论述，是对人类认识史的科学总结，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毛泽东同志关于真理发展规律的论述告诉我们：真理和错误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是辩证的统一。它们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真理战胜错误,真理得到发展。真理是不怕批评的。真理就是在同错误进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起初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前进。有时,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反而被当作毒草。真理只有在同错误进行斗争时,才能使人们从中鉴别好坏,增强识别真假的能力。这样,真理在斗争中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争取了群众。没有经过斗争的东西,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旧的习惯势力,在人们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们是不会轻易退出思想阵地和社会历史舞台的。如果不坚持同这些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正确的意见没有经过风雨,没有见过世面,遇到错误的东西就不能打胜仗,就不能克服和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真理发展规律的同时,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说时,不仅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且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还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为了进行比较、鉴别、知己知彼和吸取教训与营养,他还建议要读反面的书。他认为要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如果禁

止人们跟谬误、丑恶、腐朽、敌对的东西见面，那就会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经不起风雨，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我们出版了《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目的就是要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的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大家受到锻炼。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发展经济和文化科学的迫切要求，针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是主张在文化科学领域，坚持实行“放”的方针。他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 艺术、科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向前发展的。在艺术和科学的领域中，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什么是错误的东西，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往往需要有检验的时间。新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着，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往往如此。因此，只有通过科学界和艺术界不同风格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和反复实践，才能辨明是非，划清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之间的界限，从而发展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使文化科学和艺术得到顺利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加速文化科学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重大决策。可惜这个正确的方针，在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被中断了。相反的，却出现了一种宁“左”勿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双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什么时候按照这个方针办事，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就呈现出百花争艳，欣欣向荣的发展形势；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方针，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就受到阻碍，遭到破坏，就死气沉沉。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既为我国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开拓了光明的道路，也给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增添了光辉。

第二节　反对否认矛盾的错误观点，进一步阐明对立统一学说

一、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批判各种否认矛盾的错误观点

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的人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了，也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找到矛盾，甚至有的人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也不承认了。有些人虽然口头上承认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对立统一，但就是不能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不存在矛盾了，从根本上否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就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矛盾是否具有普遍性？毛泽东同志坚定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运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矛盾的普遍

性。他指出：是否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分界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也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可以说，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统一，不承认对立统一，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什么"找到"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两种意见存在着和斗争着，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会产生出来，产生了又解决，社会就不断地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矛盾运动之后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样的矛盾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只不过是按照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罢了。

毛泽东同志把对立统一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

为了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发展，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对矛盾双方关系的探讨。他认为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求人们能够正确处理它。他要求人们能够按照矛盾性质的不同正确处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某些矛盾的双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要削弱、压制、取消一方以发展另一方。在这方面，他有许多辩证的论述。如在阐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矛盾时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既矛盾又统一，我们不应当片面的强

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但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在论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他认为对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如果只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那市场上的货物就不够，货币就不稳定。如果用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反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更慢。如果真想发展重工业，那就要注重发展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得多些，提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关于农业合作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他主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开来或孤立地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面而削弱另一面。他在论述如何看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矛盾时说，国防一定要有，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但是，这就必须把军事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以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更快、更好了，资金充足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更快、更好地发展。

毛泽东同志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也非常重

视矛盾的转化。他根据矛盾转化的原理，提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辩证法思想。比如，对反革命分子这种消极因素也要做好工作，尽量使其转化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不中立的要争取中立，反动的也要分化和利用。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除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外，还必须防止积极因素转化为消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强化。他总是要求党和国家干部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蜕化变质；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对于人民群众，他总是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要关心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正确处理与解决他们的问题。对于阶级敌人，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区别对待和实行给出路的政策，这就可以大大减少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和捣乱，有利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向着有利于人民方面转变。对于好事和坏事，他特别阐明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指出：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好事里面也包含着坏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比如，成绩能鼓舞人，是好事，同时又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坏事，同时也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失败是成功之母，犯了错误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后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实践证明，认真贯彻和落实根据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理论制定的方针、政策，就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反之，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受到阻碍。

二、反对一点论，坚持两点论，提倡按辩证法办事

针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着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把对立统一

规律通俗地概括为“两点论”，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相对立。两点论告诉我们，要如实地承认矛盾的双方，全面地把握矛盾双方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事物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事物的次要方面。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每分析一个问题，都坚持了两点论。例如，在分析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精辟地阐明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法。指出：对国家，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他要求全面地看问题，反对片面性，并深刻地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既然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对立面的统一，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即反对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工作，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一团糟。不论是用肯定一切还是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工作，都是要不得的。他针对一点论在相当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的状况，指出要对对立统一即两点论这个观念，作广泛的宣传，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按辩证法办事。

周恩来同志在协助毛泽东同志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中，也坚持和阐发了唯物辩证法思想。比如在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上，他反对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他说：为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弯路，有必要向外国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外国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都要加以学习。但是，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必须同我国

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一定要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在教育改革方面，他坚持两点论，反对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的改革。我们在实行这种改革的时候，过去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的革命教育经验没有作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而且在学习苏联的时候，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够。

为了在全党树立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运用两点论的观点处理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中的大量实际问题。比如，在处理农、轻、重关系方面，他既肯定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又反对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倾向，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提出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方针；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提出加强国防必须先加强经济建设的方针；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提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辩证法学说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还把两点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上，提出共产党要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他们应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处理是非关系上，提出要看到在犯错误的人中间，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对他们要一看二

帮，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提出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既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又要求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这些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唯物辩证法这棵大树上的新的枝叶。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阐明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运动

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后，为了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发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的作用。他把事物的发展，对立面的转化，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死亡，都看作是矛盾的结果。按照列宁的观点，发展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矛盾。而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世界就是在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发展的，这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发展过程。就社会主义社会来看，由于它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此，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这些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矛盾运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毛泽东同志揭示了事物发展

的矛盾运动，阐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同其它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可能是直线的和一帆风顺的。为了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遵照恩格斯、列宁关于事物发展是按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理论，提出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运动。他深刻指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就是说，事物发展的波浪起伏，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引起的。有矛盾，有运动，就有波浪起伏。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根本原因，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运动，是重复性和前进性的统一。所以做工作要按照实际情况，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来决定方针政策，使工作有节奏地前进。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要经过斗争，但当人家服服贴贴、敲锣打鼓表示接受的时候，就要缓和下来。当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又要看到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也是这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又如，农业合作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要根据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的地方需要暂停一下，从事整顿，有的地方可以边发展，边整顿。有些合作社的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合作社也可以让他们暂时解散。有的地方又可以大量地建立新社，有的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期，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

衡，随后又要发生变动，出现新的不平衡。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则是相对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这是一个总趋势。它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上升运动，虽然在其前进的运动中，有时会出现曲折、倒退现象，但那是暂时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但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波浪式前进。

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也不可能是直线上升，而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由于社会上的新生事物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所以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腐朽的、保守的、反动势力的阻扰和破坏，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新生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自古以来，先进的东西，一开始总是挨骂。即使一万年以后，只要有落后和先进的存在，先进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也还是要挨骂的。共产党过去就是“非法”的，不知挨了多少骂。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① 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被先进的新生的小的力量所战胜，整个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

新生事物受到压抑、打击或摧毁，需要在斗争中发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条件限制，人们对新生事物往往认识不清。比如，为了判断一个东西是否正确，常常需要在实践中考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2页。

验，只有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才能取得多数人的承认。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历过艰苦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旧社会相比，是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除封建主义残余和官僚主义者的有意压抑外，主要是由于鉴别不清，使新生事物的成长受到了压抑。但是代表客观事物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是任何腐朽的力量所不能战胜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它的产生、成长和壮大是在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中实现的。因此，我们应当具有为新生事物的发展而斗争的勇气、毅力和智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怕困难。一切旧事物，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上，在战术上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方法，就能一个一个地将它们克服下去。

四、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范畴的理论

（一）阐明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提高人们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①。而假象和现象又有区别，所以对假象要认真对待，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要透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0页。

过假象这一表现形式来看事物的本质。例如，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另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民主制度自由多，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从现象上看问题，被假象所迷惑了。从本质上看，西方的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从本质上看，这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但必须同时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再如，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使用两面派的手法，给人以假象，将真象隐蔽着。不过这种假象，也是反革命两面派本质的反映。人们可以从分析、研究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看出他们的本质和真象。这些论述，使革命者提高了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增强了免疫力。

（二）阐明主流和支流的辩证关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这一时期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同志由于看问题的方法不对，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问题，作了过分悲观的、不切实际的估计。毛泽东同志为此教导人们要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如果不去看本质的方面、主流的方面，或者误把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看成为本质和主流，就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就要犯错误。比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对于成绩，夸大了或者低估了，都要犯错误。同样，如果犯了错误而又不承认或者有意隐瞒，也将导致更大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在我国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即个别地方发生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问题，有些人就

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怀疑。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本来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发生了对抗，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他说，对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也要分析。有的是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有的是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群众缺乏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在对待主流与支流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也有精辟的论述。比如，我国进行的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他给予了正确的回答，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思想。他说：应该看到，我们先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而且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采取这种形式有利于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所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还是就其所采取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实现了人民生活的历史变革，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这是主流。至于在上述群

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发生了一些偏差和错误，使有的人在运动中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那只能是支流，因为那些偏差和错误总是掩盖不了那些运动的基本成绩的。

（三）阐明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反对小圈子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贫穷落后的多民族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有些人只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注意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办起事来，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而且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的大政方针是抵触的。另外，还有不少青年人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知道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毛泽东同志针对这些思想状况，认为要提倡识大体，顾大局，希望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和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出发。他希望抱小圈子的人要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真正投入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行列中去。他说，我国各方面的建设都在蓬勃地发展，成绩很大。但是，目前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是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

兼顾这个原则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的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适当的安排。只有把全局搞活了，局部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是互相联系、共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比如中央和地方这个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就是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以必要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情况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能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同时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个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的上下级这个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省对县，县对区，区对乡，都不能框得太死，也要注意发挥下级的积极性。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区、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地方主义，不能说是闹独立性。总之，要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局部和全局关系的论述，使中央和地方、各条战线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有了处理各种关系的共同宗旨，同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范畴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节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长期以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矛盾的问题上，有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确立并代替了私有制之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就完全适应了，没有矛盾了。由于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一九五六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我国也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坚持用对立统一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有论述。马克思的着重点是阐明并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而毛泽东同志则是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对社会主义来说，同样是无可怀疑的真理。要使社会主义不断前进，仍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基本矛盾。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①。

首先，旧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不断地得到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的大生产代替了封建社会的个体生产和自然经济，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生产的社会化又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却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为资本家私人所占有，这就形成了直接生产者无产阶级同生产资料占有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就建立并不断加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以对付无产阶级。这样，要解放生产力，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前进，作为生产力的代表者的无产阶级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彻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凭借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去改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却不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直接生产者同时又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者，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又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不断完善服务的，体现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具有对抗的性质，是能够经过社会主义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 就我国的情况而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相适应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我国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越得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的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所以生产力能以旧社会无可比拟的速度前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主要表现在：虽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建成，还有许多缺陷，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如大多数人民公社生产队和一部分工商企业都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企业在企业管理等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继续寻找比较适应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的完全合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在上层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不断解决而又不断产生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例如，社会主义在客观上将长期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注意通过国家计划去调节，即通过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这样，通过经济计划使生产和消费由不平衡到平衡、再由新的不平衡到新的平衡，就是一个矛盾的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川流不息的过程。

二、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考察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状态，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

一九五六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的年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的只占极少数。这样大的变动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有各种不同的反映。人们一方面兴奋地看到了新时代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协调、生疏、不摸底，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大变动说明，我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敌我矛盾不再占主要地位了，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矛盾，少量的是敌我矛盾，而大量的、主要的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告诉我们，革命时代人们熟悉的东西正在逐步消逝，而大量的人们不熟悉的东西将迫使人们去正视，去谨慎、妥善地对待。以上情况表明，伟大转变时期的新形势所提出的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以指引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胜利前进。

就国际的情况看，长期以来，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等，充分暴露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综复杂情况。一方面，有一些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而不能正确地分析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情况，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另一方面是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修正主义者抹煞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干着颠倒敌我、亲痛仇快的勾当，葬送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这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迫切需要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拨开迷雾，指引航向。

斯大林指出："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①事实正是这样，面对国内国际的现实，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回答了时代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如何正确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如何正确区分两类社会矛盾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正

①《列宁主义问题》，第642页。1964年版。

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①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两类社会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而我国现在的社会矛盾，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它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此外，人民政府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

第二，科学地阐明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处理矛盾的方法要根据矛盾的性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联系起来，提出了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和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在国内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势力、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在国际上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为什么必须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一般说来，这是由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专政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

第三，阐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

化的，处理矛盾的方法要有利于矛盾的解决。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一九五六年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和我国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那末，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可不可以转变呢？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不会转变，但在我国的条件下，反革命分子中的大多数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事实上，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已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我们处理敌我矛盾时应当注意有利于这样的转化，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他特别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这是不对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①

第四，指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同志说：“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②

如何正确估计与处理反革命？正确估计应当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正确处理应该是，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6页。

同的处理，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有好处，也会有好的国际影响。

如何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即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告诉人们：“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针。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样做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并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固然应当抛弃，而仅仅依靠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同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才能解决。十年动乱中沉痛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都有过不同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去进行阶级斗争，达到阶级的消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他们也都程度不同地提到过。例如，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因而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逐步消灭这些差别。他们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又指出这还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平

等，因而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这就实际上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并主张用发展生产的方法而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至于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矛盾分析，他们讲的就比较少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提出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问题，指出“对抗和矛盾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未能作系统的论述。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联共（布）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谈到过：“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要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②但是在这里，他只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以彻底的辩证法的精神，根据时代的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析社会主义的现实，完整地系统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在理论上做出了新贡献。

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它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是它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性质、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

①《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12页。1976年人民出版社。

②《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343页。

积极因素，迅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道路。

三、研究我国历史和现实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状况，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如何对待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党有过合作历史的民族资产阶级，即如何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理论和策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一般是应把资产阶级当作专政的对象，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它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在我们国家则不然。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他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①"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②

那末，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的途径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是建立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即建立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而不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③这两种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都很必要。怎样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巩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呢？就是要实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给他们以宪法范围内的一切民主权利，对他们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

从经济上看，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赎买政策，逐步把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最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

在一定条件下，可不可以不用强力剥夺手段来消灭资产阶级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设想过用和平的手段，即用赎买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早在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在其著名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3页。

《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讲过，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以后，“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铁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①后来，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恩格斯又说：“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②这就是说，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是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马克思的观点也是一样。恩格斯介绍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③列宁更前进了一步，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计划在俄国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政策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他认为，根据当时俄国的情况，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一种有效的可行的方法。只是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勾结国际资产阶级，反抗苏维埃政权，甚至进行武装叛乱，列宁的计划才未能实现。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改造与消灭资产阶级的新的理论和政策，并且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改造过程中保持了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生产力持续发展，而且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都愿跟着共产党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315页。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逐步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史上的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上的大事。

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用和平的方法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并不是阶级调和，而是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定的阶级政策。

四、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反对个人崇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成功。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①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告诫全党：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中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同党外人士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同志在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个人的作用，但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

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①他要求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个人，任何人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要破除迷信，反对形而上学。指出：“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②他对反对神化个人，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说：“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③世界上没有完人，人总是有他的优点、缺点，正确方面、错误方面。“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也没有一个。”④他希望人们对任何人应该具有科学态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⑤

因此，毛泽东重视集体领导和发挥集体智慧，认为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他要求党在实际工作中严格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不良倾向。他说：“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⑥他还认为，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防止突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0—141页。

出个人、夸大个人的作用。七届二中全会就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即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不骄傲，不妄自尊大；一定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转变关头，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集中全党的智慧和意志，对个人和人民群众相互关系的原理作了深刻与精辟的阐述，教育全党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反对个人迷信。它强调指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它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我们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为此，必须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

①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第70页，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

的报告》指出：强调集体领导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个人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大会还深刻而明确地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有它某些反映。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①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决策是英明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以后长期的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

周恩来同志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进一步发挥了个人和人民群众辩证关系的原理，透彻地阐明了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正确态度。首先，他肯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但反对神化领袖。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的人物，但他不是天生的。我们在向别人宣传或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

①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41页。

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①其次，领袖来自人民群众，不是自封的。他说：“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第三，领袖不是超人，他有一个生长、成熟的过程。他说：“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②第四，学习毛泽东不是对他个人的迷信，而是因为他正确。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是因为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以后，就使得这个革命的方向一天天地端正起来，他在中国四个革命阶段都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他的主张是对的，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抗日战争全党承认他领导正确，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

周恩来同志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愧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他的理论光辉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一样，成为我们实践的指南。

---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4页。

简短的结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我国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集中群众的智慧，研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总结由实践证明了的新经验，回答时代赋予无产阶级的新要求、新课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短短七年里取得巨大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他阐明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性，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立统一学说，提供了"两点论"或"两分法"的认识方法，普及了辩证法的宣传，促进了辩证法的解放；又应用辩证法分析自然，分析社会生活，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使辩证法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在实际生活中大放异彩。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当作社会基本问题提出来，认为它们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基本矛盾。他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的统一，既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又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有非常重要的独到之处，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的财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党和人民的智慧的产物，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它的指引下，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前进，我们就必将取得四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结束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历史发展形成的。它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我们应当正确地阐明它，既要反对过分拔高，又要反对任意贬低，而应当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去作出科学的评价。

要确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必须遵循继承和发展、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基本理论方面说，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辩证自然观、唯物历史观等方面，都有不少重要的贡献和发展；从实际运用方面说，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和各项实际工作，创造性地阐述了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等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在唯物论方面，提出著名的“实事求是”原则，深刻发挥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斗争的发展史时，精辟地指出：“全部哲

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并论证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区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标准，明确地回答了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科学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都有许多经典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深刻的阐述。它不是一般地从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的命题出发，而是以中国化的民族语言来表述，并着重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诸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命题，都贯穿着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思想。

中国革命实践表明，在我们党内无论是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理论上或口头上都承认唯物论，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唯物主义前提。但在实践活动中却往往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结果导致在政治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②。就是说，他们把存在统一于思维，客观统一于主观。而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①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落后于存在，主观落后于客观。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彻底克服和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清算错误路线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从世界观上清算错误路线，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所以，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所碰到的思想论敌，虽然也有地主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的公开宣扬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但在革命内部和党内却主要是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所批判的对象主要不是以学术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以主观主义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活动中的唯心论。

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②而在稍后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性表现形式的本本主义，他强调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必须努力作出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③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的原则，正是毛泽东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斗争，是毛泽东哲学唯物主义和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

③《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5页。

本问题，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哲学表现。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为此，他把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深刻阐明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理。阐明这个真理，并明确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突出贡献。

二、在认识论方面，系统论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马克思、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始人。他们把认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第一次把实践纳入认识论，指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必须把认识的能动性应用于反映论，即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等等。他们提出的这一系列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列宁所处的时代，认识论成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焦点。当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动了猖狂进攻。列宁以最大的勇气迎接了敌人的挑战，在百忙中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他阐明了"从物到

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两条认识路线的基本区别。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 提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② 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著名论断，等等。由于列宁所面临的论敌的主要是唯心论的哲学倾向，所以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的基础上，而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辩证途径，都未来得及从完整的理论形态上充分地系统地展开论述，这就为以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提出了系统化的任务。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无论是犯右倾错误还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没有能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的过程。为了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引导群众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对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进行详尽地系统地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直接完成了列宁所提出而未完成的任务，这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同志坚持实践论，反对先验论，不是一般地从宣传讲解认识论原理出发，而是针对从两个极端出发来割裂理论和实践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的统一的哲学倾向，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个矛盾，突出和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以此为中心全面展开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系统论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道路；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全过程，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等等。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结合起来，使它成为真正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实践论》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它是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后来，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深刻地阐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辩证法，重申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从而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实践论的根本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在辩证法方面，集中论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研究了科学发展史、思想发展史，批判地吸收了旧哲学的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创立的，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哲学上引起了巨大的革命。为了通俗地讲解辩证法，马克思1858年1月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说：如果有机会，他打算写一本“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辩证法专著。① 虽然马克思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他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石上，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从而使辩证法成为科学的世界观。

列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一步总结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深入地分析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写下了《哲学笔记》这一光辉文献。列宁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应用于认识过程和发展，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单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 后来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作了初步的说明和发挥，但毕竟是纲要式的短文，未能从完整的理论形态上系统地加以论述。根据列宁写作《哲学笔记》来看，他有一个写作辩证法专著的宏伟计划，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繁重的工作，致使《哲学笔记》成了列宁未完成的辩证法论著的宝贵遗产。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纷纭复杂相互交错的矛盾，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是世界所罕见的，使中国成了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在这个包含有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总体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并捉住其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碰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就决定了矛盾学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撰写《矛盾论》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矛盾论》是对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法专著。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他不是一般地从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理论出发，而是针对党内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否认“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系统地阐明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尤其是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从而使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更加理论化和深刻化，在辩证法理论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研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典范，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离不开《资本论》的话，那末，同样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则是把辩证法运用于军事学的典范，我们研究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时，同样地也离不开研究这些重要文献。这表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既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的运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占据着光辉的一页。不了解这一点，也就不能完全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

当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际上形而上学思潮泛滥，鼓吹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否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的动力，这就无异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复教育全党要按照辩证法办事，要用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的新问题，观察和分析国际斗争中的新矛盾。他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长期实践斗争中，还善于把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使辩证法广泛地普及于群众之中，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在这一方法论体系中，有基本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两个方面。其基本方法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等等。其具体方法有：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两条腿走路，波浪式前进，等等。这表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家。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

四、在辩证自然观方面，着重指出了物质的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既是客观实在的，又是具有内在矛盾和无限可分的，坚决驳斥了那种所谓有"最终的"物质实体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①他们总结了自然

①《反杜林论》，第8页，1970年版。

科学的巨大成就，写下许多论述自然辩证法的光辉著作。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从多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关于哲学物质概念，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在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①他还说："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②这就是说，哲学上所说的物质概念，是指各种具体事物的共同的属性，即客观实在性。可是，在十九世纪，还有些自然科学家错误地把原子当作"最终的"物质实体。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③从而驳斥了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此后不久，由于电子和放射现象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谬论的同时，总结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给物质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④他还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

①《自然辩证法》，第233页。1971年版。

②《自然辩证法》，第214页。1971年版。

③《自然辩证法》，第247页。1971年版。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

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①就是说，哲学物质概念，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由于电子的发现而引起自然科学物质结构概念的改变时，有些自然科学家便硬说电子是“最终的”物质实体，并认为已经穷尽了电子的一切特性，因而竟然宣称物质“消灭”了，物质概念“过时”了，唯物主义被“驳倒”了，等等。列宁在分析这种错误思潮的原因时说：“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②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深刻地指出：“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③后来，现代物理学中有关质子、中子、介子、光子等基本粒子的相继发现，又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同志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也对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成果作了高度的哲学概括。早在《矛盾论》中，他就提出了“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的光辉思想，揭示了自然界运动发展的内在源泉。他还说过：“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只有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才能摆脱自然规律的奴役而获得自由。

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成果，几乎超过以往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268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

④《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几千年的总和，不论在宏观世界还是在微观世界都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毛泽东同志极为关心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成果，从哲学高度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新鲜经验。他运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说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一九五五年一月，在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上，当有人谈到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时，毛泽东同志就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是可分的。"当时，这一看法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惊异，许多人不相信。可是，事隔半年以后，美国科学家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这就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预见。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就原子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进一步作出了哲学概括，指出："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①。一九六四年，当他读到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后，就指出，它对于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有重大意义。后来，他在同一些中外科学家交谈中，提出了宇宙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无限性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在太阳系外存在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下去。晚年，他还十分关心基本粒子研究的进展情况，希望从中得到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新的自然科学证据。②这表明，毛泽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351页。

②参见杨振宁：《思想家·领袖·非常注重实际的人》，美国《新中国》季刊。

东同志虽然没有自然辩证法的专门著作，但他提出过自然辩证观的重要思想，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

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的论述，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把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学说贯彻到底，破除了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曾说："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预见了二十年后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在实践上，它给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实验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物理学家于1965—1966年间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是由物质结构的更深一层的"层子"所组成，受到世界各国物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一九七七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一著名物理学家建议，为纪念毛泽东对关于物质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的重大贡献，应将现在称为"层子"或"夸克"的微观粒子命名为"毛粒子"。一九七九年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高能物理实验小组发现了"胶子"的踪迹，这表明层子也是有结构的，可能存在着更深的层次。

五、在唯物史观方面，重点阐明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的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引起了哲学的革命。恩格斯说："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① 他还指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两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称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是对以往历史理论的革命。①同样，列宁也十分重视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和社会生活，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产生，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社会历史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注意力是反对各种唯心史观，阐明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因而着重于经济的研究。他们一再指出：物质资料和生产方式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变革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②。他还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③显然，他们较多地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强调得不够。对此，恩格斯后来还做了自我批评，但同时指出：在“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④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日益滋长起来，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唯物历史观，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

①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性，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也乘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庸俗化，把它歪曲成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等等。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又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唯物主义当作公式、标签到处生搬硬套。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了新的论述：第一，既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指出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其他各种因素；第二，既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又指出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有着巨大影响，对于“斗争形式”方面，在许多场合起着“决定作用”；第三，还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从而彻底粉碎了德国的反动社会学者保尔·巴尔特之流的攻击，同时也批评了德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这样，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中，既坚持了唯物论，反对了唯心论；又坚持了辩证法，避免了形而上学。

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他在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批判了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的机械唯物论观点。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对“一定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紧接着他又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这显然是在恩格斯的思想基础上深化了，表达得更明确、更彻底，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这种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念，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继续坚持和发挥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创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谱写了新的一页。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在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时说，马克思的英名和事业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有两个是很杰出的：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紧接着，他说：一个人“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②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命的时代，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理论；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作的重要贡献中，则揭示了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运动的特殊规律，进而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而使列宁和毛泽东的英名和伟业将永远彪炳于科学史册。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列宁逝世之后的最主要的代表。它在一系列基本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夸呢？不是。除了它的敌人以外，这是世界人民所公认的。请看事实：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在题为《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底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还说："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①

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一年第74期（中文版）上，发表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一文中说：这篇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篇著作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

①《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其目的在于教育干部进行中国革命，它是在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写的。因此，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瞭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重要的资产。”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6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和主要的理论著作，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宝库的丰富，对于一切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际的益处。”

一九五五年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①

一九五八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教科书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②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理论家都纷纷撰文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指导意义。有的说《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是他们党的教科书。亚非拉美的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也认为，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毛泽东“丰富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现在和将来都是评论分析人类历史、

①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中文版。

②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政治和社会大事的可靠准则。”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新华社编译的《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一书中，选编了世界各国各界人士悼念毛泽东主席的声明、谈话、诗歌、回忆、文章和报刊评论，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随处可见。它反映了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资产阶级比较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富有特色的理论。美国一位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各家进行比较研究后，在西德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还说：“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这篇导言阐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实质。”

至于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理论家们一反常态，连篇累牍地放肆地歪曲、贬低、抵毁和攻击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不奇怪的。正如法国的一位学者所说：那些人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才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到昨天为止还占有光荣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统统删去。”①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际共产主义杰出的活动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实践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在

---

①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1973年，巴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在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有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的同志，一定能够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推向前进。

编者的话

本书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的概况，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从时间上说除绪论外，只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余部分待以后有机会再行增补。

本书各章执笔人如下：第一章：宋一秀（北京大学）、杨梅叶（北京化工学院）；第二章：林仁栋（南京大学）；第三章：宋一秀、许全兴（北京大学）；第四章：王棣棠、鲁修文（兰州大学）；结束语：宋一秀、鲁修文。

本书的统一修改补充工作，是由宋一秀、鲁修文同志负责完成的。鲁修文同志通阅和校订了全书，查核和统一了全书的引文。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得到全国许多兄弟院校、研究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对此，我们谨表深切的谢意。

编著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一个初步尝试。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研究，书中的问题、缺点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研究工作的同志批评指正。

编　者

1982年12月